

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 國語「同化」教育政策 ——以日本的近代思想史為座標——*

陳培豐**

摘要

本論文是以歐美統治下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和日本的近代史為思考座標，把多半被拿來當做分析概念的「同化」當做分析對象，繼而來解析日本統治下臺灣「同化」政策之原理及結構。

在找出臺灣「同化」政策的特異性並探討其特異面與(一)近代日本的建國原理——「國體論」和(二)上田萬年的國語思想之關連性後，筆者認為：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政策雖然具有以文明及文化為中心之兩義的實質內涵，但也同時擁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及工具性。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被當做道具時的「同化」及具有實質內涵的「同化」都具有明顯的流動性。而統治者在提倡國語「同化」教育時，經常都以上田萬年的國語思想為媒介，試圖去賦與自己一個統治形態上的印象，那就是「走向『一視同仁』」、「走向日本民族」。而統治者之所以會執著於這樣的統治策略，其目的則是為了彌補以「國體論」支配臺灣時所造成天皇制國家原理的破綻。因為，基於擬血緣制國家原理和「一視同仁」這兩個主軸概念所成立的「國體論」，與支配殖民地異民族這個政治事實在理論上是相互衝突、矛盾的。筆者認為「同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維持整個天皇制國家政治體制的平衡。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並不完全等於一般殖民地學所說的 assimilation，而是受制於「國體論」而產生出來的一種統治策略。

關鍵詞：「同化」、擬血緣制國家原理、「一視同仁」、「國體論」、上田萬年

* 本論文在完稿過程中，承蒙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女士給予措詞用字之修改，同研究所周婉窈女士賜與意見，在此致上感謝之意。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同化」問題之研究近況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臺灣經歷了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對於這半世紀中日本統治的方針及內容，一般學界幾乎都把它定位成「同化政策」。然而，把臺灣統治定位成「同化政策」，其學術上的基礎與根據其實並不是很充分。

「同化」一詞源來自於十九世紀歐美殖民地政策中的“assimilation”，其基本精神是把殖民地統治當做是本國施政的延長。一方面盡量排除暴力、殺戮之統治手段，將被統治者的文化、社會組織的特殊性壓抑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則對殖民地當地居民進行血緣、精神、思想上的同質化措施，讓他們溶入統治者的社會價值體系中。同時，施政者也賦與被統治者和本國人民類同的參政權力。⁽¹⁾ 從排除暴力統治、注重精神上的服從與征服，以及統治者與當地居民之間的融合政策方針等來看，臺灣的「同化」政策和“assimilation”的確是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²⁾ 然而“assimilation”與臺灣統治的實際內容、特徵其實還是有某些距離，並非完全契合。

與個例子來說，“assimilation”雖然有鼓勵統治者與當地居民之間通婚，以達成民族融合之政策意圖，但並沒有透過學校教育試圖「將臺灣兒童變造日本兒童」，或「變做日本人種」的精神傾向。⁽³⁾ “assimilation”典範的阿爾及利亞，其初等教育也並沒有像臺灣一樣，完全以統治者的語言來進行。⁽⁴⁾ 再者，在臺灣以通婚的方式來達成民族融合的政策並沒有被積極推行過，臺灣人的參政權也受到日本政府強力的壓制，僅止於聊勝於無的狀況。雖說如此，日本的臺灣統治卻擁有全世界殖民地史上前所未見，積極而強烈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因此，精確地來說，臺灣人在日治時期所接受的只能算是日本帝國主義式的「同化」政策，而並非完全是西歐式的“assimilation”。戰後學界在敘述日本的臺灣統治時，

(1) 天澤不二郎，《植民政策入門》（東京：巖翠堂書店，昭和14年），頁115-118。

(2) 本文中把日本統治下臺灣的所謂殖民地同化政策加上括弧，是為了方便和“assimilation”做區隔。

(3) 唯漢，〈駁臺日社說的謬論〉，《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4月24日。

(4) 根據ベツゲル（Herbert Theodor Becker）著；鈴木福一、西原茂正譯，《列國の殖民地教育政策》（第一出版會，1943）的說法，因為宗教信仰方面之理由，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時是准許大部分的回教學校以阿拉伯語做為教學工具的。

普遍被使用的「同化政策」一詞，與其說是嚴密的學術分類用語，不如說是習慣上延續了日本統治下歷史現場上的稱呼而產生的現象。

然而或許是由於長期受到承襲著這種歷史現場上習慣稱呼的影響，「同化政策」一詞開始有被轉成一種史實認知的傾向。在「同化」逐漸「質變」的狀況下，大家好像遺忘了在學術研究上「同化政策」，其實是一個頗有研究必要和價值的題材。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日本等地有關「同化」的研究顯然都遇到一個瓶頸。更具體地說，這些研究普遍缺乏下列五個問題意識：

(一)所謂的「同化」到底有什麼具體內容和意識形態？

(二)「同化」的內容和意識形態是否隨著時間的變化有所改變？

(三)與同時期的歐美殖民地統治和日本近代歷史中所謂的國內殖民地北海道、沖繩比較起來，臺灣的「同化」到底具有什麼特徵？其存在的意義為何？

(四)統治者實施「同化」的必要性何在？

(五)對於「同化」，臺灣人是以什麼態度去對應？是抵抗、接受、妥協還是催化？

近年，日本學者駒込武打破了這種「同化」的研究瓶頸。駒込在他一九九六年的著作《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殖民地帝國的文化統合）中打破一般研究者把「同化」當成是分析概念的習慣而把「同化」轉換成爲分析對象，並透過「國語」教育的解析，⁽⁵⁾對整個日本帝國實施「同化」政策的背後原因及「同化」本身的意義、架構做了詳細的探討。其論文出現後在日本掀起了一陣研究「同化」的風潮。⁽⁶⁾

在《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中，駒込將臺灣的「同化」政策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國民統合」的架構中來討論。經過概念整理與再定義後，他將國民國家的統合原理，簡化區分爲法政制度方面的「國家統合」與文教思想方面的「文化統合」兩種面向，再運用這樣的概念，深入分析殖民地的「同化政策」。駒込認

(5) 國語一詞對臺灣人而言是「日語」，為考慮本論文趣旨及便於閱讀，筆者在以下正文中省略括弧而直接引用這個歷史現場上的說法。

(6) 駒込武的著作問世前後，把「同化」當做分析對象來探討的研究論文至少有イ・ヨンスクの《「國語」という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6）、小熊英二の《「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關係》（東京：新耀社，1998）、石田雄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思想》，1998年10月、11月），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承襲了駒込的問題意識和精神，也都有其發現和主張，並且在日本學界都受到相當的注目。

為統治臺灣時，日本帝國主要面臨的是要將臺灣置於天皇制國家之「內」部或「外」部的問題，在經過爭論後，日本所建立的殖民體制是一個在「國家統合」的層次上排除臺灣人，而在「文化統合」的層次上標榜容納臺灣人的矛盾架構。⁽⁷⁾

基本上筆者贊成駒込的結論。不過從臺灣史的觀點來看，駒込的論文呈現了幾個問題，例如他把「同化」的定義、內涵局限在精神、情緒、情感上的日本人化，認為在實施國語「同化」政策的過程中，日本政府掠奪、破壞了臺灣人的傳統與文化，因而臺灣人對於這樣的「同化」政策是拒絕、抵抗的。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臺灣初等教育的高普及率以及臺灣社會顯著的近代化建設成果來看，這種全面否定「同化」的觀點，似乎只能反映出臺灣統治中的某一個歷史層面，而難免令人有偏頗的感覺。其實駒込主要的研究意圖，是想透過殖民地「同化」政策的解析，來觀察或批判近代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態。因此他在解析「同化」的過程中似乎過於強調「同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忽視了它也曾為臺灣留下一些正面的遺產。換言之，本來歷史過程中應該並存著「光明面」和「黑暗面」，而駒込的觀點過於偏向後者，因此他所描述的「同化」也就難免讓人有刻板、教條的印象，而無法精確地反映出歷史的全貌。

筆者認為包括駒込的論文在內，戰後有關臺灣的「同化」研究似乎有過分強調日本殖民地統治政策的普遍性，而忽視甚至無視其特殊性的傾向，⁽⁸⁾ 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說明日治時期臺灣的「同化」統治政策為什麼會造成顯著的近代化結果這個問題時，或者是戰後臺灣社會為什麼會有肯定日本統治的聲音存在這個現象時，多少都有一些限制、困難和欠缺解釋力。

雖然這些日本學者們研究「同化」的重點都是在統治者的日本，但是被統治者對於「同化」統治的評價與反應是足以質疑並挑戰他們的研究成果。當然，當我們正視日本治臺的「同化」之特殊性，主張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曾為臺灣帶來許

(7) 有關駒込武的《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之內容介紹及評論，請參考《新史學》11:4 (2001年2月) 中何義麟所寫的書評。

(8) 例如在《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一書中，駒込以國家統合與文化統合的概念做為分析臺灣「同化」政策的主軸。然而，他似乎忽略了在整個歐美的殖民地統治歷史中，國家統合與文化統合並非是統治常態，而是一個特例。殖民地統治最重要的是經濟上、領土上、資源上的掠奪與占有。上述兩種統合是達成這些目標的眾多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選擇。換言之，執著於國家統合與文化統合的日本統治現象，應該作為分析對象，不適合直接拿來做為分析概念。

多近代化時，我們也必須面臨另一個課題，那就是接受普遍存在於世界上殖民地統治研究成果的挑戰，去說明為什麼日治下的臺灣可以成為世界殖民地歷史中的特例。因為當今世界各國的殖民地研究成果主流都是在否定殖民地統治與近代文明之間的關連。⁽⁹⁾ 如果說完整的歷史研究是要兼具「因」、「果」關係的解析和說明的話，對於當今研究臺灣殖民地統治史的學者們而言，前者似乎是一個有待加強的課題。

殖民地統治雖然始源於歐洲，同樣基於歐洲文化背景下建構出來的殖民地統治形態卻不盡相同。例如標榜同化政策的法國，其統治內容和精神受到法國大革命時民主、平等、啓蒙思潮的影響，其同化政策因此有異於英國而比較容易接受異民族間的通婚。曾經是日本殖民地政策學最重要的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指出，殖民地政策是宗主國政治、傳統及文化的投影。通常是以該國的社會形態、政治思想、文化特徵為基礎而架構成形。⁽¹⁰⁾ 在這個前提下，殖民地統治在具有普遍性、類似性的同時，也具有個別性和特殊性。更何況日本是亞洲唯一的殖民地宗主國，其殖民地統治方針的形成經過、結構原理、特色皆異於歐美各國。光只承襲曖昧、模糊的「同化」用語與觀念，或選擇性的漠視其統治上所造成的「光明」成果，甚至忽視其特殊性，恐怕無法正確掌握日本統治下臺灣的歷史脈絡。

爲了克服上述問題，在本文中筆者先以歐美統治下的同化政策和日本的近代史爲座標，在相互比較下描繪出臺灣「同化」政策的特殊性和「光明面」後，繼而探討其特殊性與近代日本的政治思想、語言觀的關係，即日本在臺之「同化」政策與近代日本之「國體論」、國語思想之關連性，以解析「同化」之原理及結構。

(9) 在エメ・セゼール著，砂野子幸稔譯，《歸鄉雜記——植民地主義論》（《歸鄉ノート——植民地主義論》（東京：平凡社，1997），頁122-123；Frantz Fanon 著，鈴木道彦、浦野衣子譯，《被土地咀咒者》（《地に咒われたる者》）（みすず書房，1996），頁309；及平野千果子，〈文明化和法國植民地主義〉（〈「文明化」フランス植民地主義〉，《思想》（2000年9月）等文中均舉出大量的事例，否定殖民地統治與近代化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並認為把殖民地統治和文明化劃上等號的想法和設問，是犯了根本上的錯誤，甚至是一種集體偽善行為之產物。因此戰後部分臺灣人對於殖民地統治的肯定態度，在世界殖民地歷史觀中算是一種特殊現象。駒込武的研究成果雖然符合了一般學界的說法，但卻無法對現今存在於臺灣社會的特殊現象做一個適當的解釋。當然臺灣的學者在主張或承認日本統治帶給臺灣許多近代化的正面遺產時，也應該要先去接受普遍存在於世界上的殖民地統治研究成果的挑戰，對臺灣之所以會成為世界殖民地歷史中一個特例之原因與背景，提出學術上的說明。

(10)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地政策比較の一論〉，《國家學會雜誌》51:2，頁178-181。

換言之，筆者試圖要探討的是前面所列舉有關研究臺灣「同化」政策的瓶頸之項目中第(一)至(四)的部分。限於篇幅的關係，「同化」具體落實臺灣之經過，或是臺灣人對於「同化」是抱著什麼態度去抵抗或接受這一部分，也就是有關項目中的(五)的部分，將另行撰文討論。在研究方法方面，筆者則與駒込一樣將以國語教育做為探討「同化」政策的主軸。在臺灣統治中，實施「同化」政策的手段是多樣的。例如，度量衡、經濟、法律面的統一，通婚、和服的穿著等生活習慣上的同一化都是「同化」政策或運動中的一環。然而以施行期間的長短、持續性、積極性、普及層面的規模、投入經費的多寡，還有政策的一貫性來看，無疑地，國語教育是實踐「同化」最主要的手段，其成果也最為顯著。「同化」與國語教育之淵源、關連和互動也最為密切。要探討橫跨半世紀之久的「同化」政策之原理與架構，國語教育的分析應該是一個適當的切入點。

二、橫座標上的「同化」——臺灣「同化」政策的特異性

明治二十八年（1895），甲午戰爭結束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在當時日本領有臺灣至少代表了二個重要的意義。對日本而言，其象徵的意義是除了北海道之外，日本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擴張海外領土，並奠定了爾後併合朝鮮等一連串海外領土擴張的基礎。另外一個意義則是，對於世界而言，日本這個新興殖民地統治國的出現打破了當時西歐支配亞洲的既有殖民地政治結構。因為日本是東洋唯一的殖民地支配國，其存在和施政內容都引起世界各國的注目。然而和當時的殖民地統治比較起來，臺灣的「同化」教育政策呈現了非常特異的現象。茲將其詳情整理如下。

(一)教育機會的均等主義

爲了增加溝通上的方便以更有效率地達成教化或榨取殖民地當地住民的目的，基本上殖民地統治都有實施教育的必要性。然而，在十九世紀，鑑於殖民地教育容易激起當地住民的近代化思想及民族意識的自覺而危害治安，除非迫不得已，西歐列強對殖民地教育均採取謹慎的態度；即使不得已而實施教育時，其對象通常是由統治者來選擇決定，而隨著地區、人種、階級之不同，其教育內容也

是相異的。例如，在荷蘭領地的東印度，爲了因應不同階層的住民，所謂的學校是分一等學校和二等學校，其教育內容也有明顯的難易之分。就連舉著同化主義旗幟的法國在其統治下之中南半島實施教育時，其主要對象也只是當地居民中的領導階層，而一般民眾是與之無緣的。⁽¹¹⁾

然而，明治二十九年（1896）臺灣總督府公布了臺灣獨自的教育規則「國語傳習所規則」後，漢民族主要居住地域的平地和多數所謂高砂族群居的山地裏便同時展開教授國語的課程。翌年，更正式推行了女子教育。明治三十三年（1900）針對身體殘障者設立盲聾學校。⁽¹²⁾ 在標榜著所謂「一視同仁」的施政方針之下，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兒童之外，對於「新附民」臺灣總督府實施了以教育機會均等主義爲中心的政策。也就是說，臺灣的「同化」教育是不分男女、階級、人種，不管在山間僻地、都市或離島，全面性進行、實施的。

對此教育體制，當時明治政府所聘雇的英國人顧問 W. M. H. Kirkwood 則驚嘆不已地做了一連串修正的建議。W. M. H. Kirkwood 警告日本政府說：無差別式的教育體制對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經濟，並且禍害無窮。如果爲了統治溝通上之方便，與其讓大多數的臺灣人去學習日本語，不如叫一小部分的日本人官員去學習臺灣話來得經濟、合理。總之，W. M. H. Kirkwood 認爲臺灣總督府應該模倣英國採用自主主義式（autonomy）的教育方針，對教育應該採取不干涉、不鼓勵的放任態度。⁽¹³⁾ 雖然在法律制定上 W. M. H. Kirkwood 的建言對日本政府擁有相當的影響力，但他的意見在教育方面並沒有被採納的跡象。

（二）以初等教育爲中心的「同化」方針

既然以教育機會均等主義來實施「同化」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就必然成爲其首要之務。根據昭和二十年（1945），臺灣總督府所發行的《臺灣統治概要》之統計，領有臺灣約五十年後，這個小島擁有官立、公立國民學校共 1,099 所，高等普通學校 46 所，實業學校 117 所，師範學校 5 所，專門學校 5 所，大學 1 所，特殊

(11) 長尾一三二，〈帝國主義政策と殖民地・從屬國の教育〉，《近代教育史》（東京：誠文堂新光社，昭和 31 年），頁 47。

(12) 山根勇藏，〈國語普及に關する施設調査〉，《臺灣教育會》，213 號（大正 9 年 2 月），頁 5。

(13) 〈カークウート氏臺灣二關スル覺書說明筆記 第一回〉，《後藤新平文書》7-33-3，頁 41-45。

學校（盲啞學校）1所。從甲午戰爭後盡力於「同化」教育的結果，在昭和十九年（1944），臺灣全島擁有合計超過一千所的初等教育機構，其人數達到 872,507 人。而相對的，大學卻僅有一所，其中臺灣人的學生數也只有 111 人。⁽¹⁴⁾

很明顯的臺灣殖民地教育的實施重點是在初等教育。然而和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和法國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比較起來，這種以初等教育為中心的教育方針是具有其特異性。英國領有印度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一八五四年。然而領有後，同樣經過了半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印度的學院（college）的數量是文科 161 所，醫科 4 所，法科、工科、教育科各 3 所，農科、東洋科各 1 所，合計 167 所⁽¹⁵⁾ 一九二一年，印度的中等學校學生數甚至凌駕了英國本土，學院（college）的學生的數量則達到數十萬人之多。可是另一方面，爲了顧慮民族運動的萌芽壯大，英國當局對於初等教育並不熱心。領有印度後八十年的一九二一年，印度住民中男子的識字率只有 13.9%，女子也只有 2.1%。⁽¹⁶⁾ 而根據 E. Patricia Tsurumi 所言，十九世紀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之所以偏重高等教育，其原因是要將本來敵視英國的印度人薰陶成大英帝國熱烈的支持者。⁽¹⁷⁾ 然而眾所周知，日本實施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要培養忠於日本帝國的臣民。但是對於同一目標，日本所採取的手段與英國卻正好相反。

就在這樣的統治體制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殖民地義務教育實施體制正式的確立了，臺灣兒童平均就學率高達 71.3%。⁽¹⁸⁾ 這是日本領有臺灣後僅僅半世紀的成果。這個數字不要說是殖民地，和同時代歐米先進國家比較起來都不遜色。順便一提的是，被認爲是殖民地同化主義統治的代表而經常被提起的阿爾及利亞，其在法國統治下，從領有當初的一八三〇年算起一百年後，也就是在一九三〇年前後，公立學校的兒童就學率僅止於男子 11.5%，女子 1.5%。⁽¹⁹⁾

(14) 《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昭和 20 年），頁 51-52。

(15) 幣原坦，《殖民地教育》（東京：同文館，大正元年）。

(16) ベツゲル著；鈴木福一、西原茂正譯，《列國の殖民地教育政策》（東京：第一出版會，昭和 18 年），頁 237。

(17) E. Patricia Tsurumi, "Colonial Educ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in Ramon H. Myer and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臺灣統治概要》，頁 52。

(19) ベツゲル著；鈴木福一、西原茂正譯，《列國の殖民地教育政策》，頁 311-312。

(三)特立獨行的同化政策

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的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萬國博覽會所召開的國際殖民地社會學會議中，荷蘭和阿爾及利亞的代表等紛紛發表了意味著宣告同化主義破產的宣言。會議中各國代表強調與「原住民社會做調和」的主張，⁽²⁰⁾ 否定同化政策實施的適當性。經由這次會議全世界的殖民地統治的潮流便逐漸轉向自主主義。伴隨著這種轉向，同化教育不但被認為統治成本高昂，也違反世界道德觀與文化觀，容易造成社會的動亂，因而陸續被統治者所放棄。取而代之的便是以實施農務勞動、手工業生產為主流的實務性教育。⁽²¹⁾ 儘管世界潮流如此，日本的臺灣統治還是依然故我，特立獨行。因此，矢內原忠雄認為臺灣的國語教育是「時代錯誤」的決策，是世界殖民地歷史中稀有的例子。

除了教育之外，在臺灣的「同化」政策，其本質也是相當特異的。根據矢內原忠雄所說的，通常同化政策的主要定義是把殖民地統治當做本國施政的延長，在實施與母國同一法律、經濟、社會制度之同時，也賦予當地居民平等的待遇。於是母國議會中殖民地所選出的議員之有無、數量的多寡成為檢視「同化」主義的主要條件之一。然而，事實上在臺灣「當地居民參政權幾乎等於零，並且總督的專制到達了極端」。⁽²²⁾ 日本在臺灣實施的「同化」政策，其對於臺灣人在政治上、社會上權利平等的改善欲望和跡象不似法國積極，但卻有比法國更為熾烈的「同化」國語教育政策。從法律體制上「六三法」問題的存在，或是參政權的程度來看，日本在臺灣推行的政策是否能稱為同化主義，其實是還有商榷的餘地。而如果以臺灣統治中長期間存在著以憲兵、警察為主的統治事實來觀察，臺灣統治甚至還具有相當濃厚的從屬主義（subjection）政策的性質。⁽²³⁾

(20) 小熊英二，〈差別即平等〉，《歷史學研究》，662號（1994年9月），頁20。

(21) 長尾一三二，〈帝國主義政策と殖民地・從屬國の教育〉，頁129。

(22)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地政策比較の一論〉，頁22-35。

(23) 同上註。

三、縱座標上的「同化」 ——日本近代史中臺灣的「同化」政策

與歐美殖民地統治相比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明顯地具有特異性。不但如此，以日本近代歷史的脈絡來看臺灣的「同化」教育時，同樣也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日本近代歷史上國語「同化」教育的先驅並不是其「國內殖民地」的北海道而竟然是臺灣。

(一)國語「同化」教育的先驅

「(臺灣總督府)對本島人的教育幾乎是全數投入在國語教育中，其他科目只是副次元的存在」。⁽²⁴⁾就如戰前殖民地國語教育者國府種武所指出的，事實上從領臺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初等學校中的國語教授時間數經常維持在全科目的50%至75%之間。而這樣的教育方針在西歐統治下的一些殖民地是看不到的。爲了考慮殖民地原住民的人種構成、宗教、歷史等之不同，連積極實施「同化」教育的法國，在制定初等教育的語言政策時，不但沒有拘泥於法語的跡象，縱使在使用法語爲教育工具的地域，也看不到授業時間數比例如此高的現象。而一般人依統治時間的先後，或許會認爲以國語爲「同化」核心的臺灣教育方式是模倣日本統治蝦夷、沖繩等所謂國內異民族的結果。然而，這種想法是不完全正確的。

在歷史上，日本最初遭遇到的異民族統治並非臺灣，而是對北海道蝦夷民族的支配。把海外殖民地的臺灣和當時已經是日本「國內殖民地」的北海道相比較，可能有人會認爲不大適當，但以兩者對於日本而言都是異民族，且都被定位成實施了「同化」政策這兩點來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和蝦夷、沖繩的語言政策是具有比較意義的。

幕府時期的松前藩政對於蝦夷所實施的「同化」政策，其重點是採取鼓勵這些異民族放棄傳統的狩獵生活方式而從事農耕作業。⁽²⁵⁾在其過程中卻是禁止他

(24) 國府種武，《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第一教育社，昭和6年)，頁17。

(25) 海保洋子，〈近代天皇制と「異族」の「臣民」化研究ノート〉，《歷史評論》，1975年9月號。

們使用「高貴」的和語。到了幕府後期，松前藩政開始進行和語普及政策，但其動機與目的是加強國防，亦即是爲了防止俄羅斯南下勢力的擴大而行使的一種政治與經濟策略，而並非是爲了「同化」。至少在明治二十年代前後，蝦夷的語言政策經常是附帶性質，明顯欠乏一貫性。⁽²⁶⁾ 又同樣的現象也見於古琉球。至明治十七、十八（1884、1885）年左右，不要說是企圖以「國語」來達成琉球人的「臣民化」，就連古琉球的平民要使用或學習日本的假名文字都是被禁止的，違反者甚至還可能受處罰。⁽²⁷⁾ 雖然同樣被定位爲「同化」，至少在明治中期，日本並沒有對其支配下的異民族實施過積極的語言教育政策。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在近代日本史上在制度上首次將「國語」列爲學校的正式科目，並把「國語」的內容規定爲東京中流人士所使用的發音聲調的，不是統治蝦夷時的幕府政府，也不是爾後的日本本國政府，而是甲午戰爭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管轄下的相關教育機構。⁽²⁸⁾ 有關臺灣統治與近代日本國語的形成以及日本的國語在形成過程中具有什麼時代意義和意識形態，稍後本文會有概略的說明。在此事先要釐清說明的是，有關國語的制定等問題，身爲殖民地的臺灣反而是經常扮演著領導內地母國的角色。說臺灣是國語「同化」教育的先驅是不爲過的。

(二)非經濟性的教育政策

在《帝國主義下の臺灣》（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中，矢內原忠雄把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定位爲「早熟的帝國主義」。其理由是，雖然在甲午戰爭中日本獲得了勝利，但以資本主義發展的狀況來看，日本還沒有具備做爲一個殖民地宗主國所需的萬全準備和經濟條件。⁽²⁹⁾ 例如，明治二十九年度的臺灣經營預算是 1,800 萬圓，這占了當時日本總預算歲出額 1 億 5,227 萬圓中的一成以上。⁽³⁰⁾ 臺灣領有當

(26) 豐田國夫，〈日本の言語政策〉，《國語政策の研究》（錦正社，昭和 43 年），頁 89-94。

(27) 根據前引豐田國夫所指出，直至明治 17、18 年時，教八重山的平民學習或讓他們使用假名、漢文都是被禁止的，違反者還可能受到處罰。而從記錄看來，明治 26 年首里、那霸的尋常科一年生的教學課程主要是以沖繩語來進行（前引豐田國夫，〈日本の言語政策〉，頁 116）。

(28) 駒込武的《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陳培豐，〈近代日本の國體イデオロギーと臺灣の殖民地統治——上田萬年の國語觀を中心に〉，《中國研究月報》，1995 年 9 月；長志珠繪，〈教化と文化の間——「國語」問題と領臺初期〉，《文化交流史研究》，創刊號（1997 年 5 月）中也有詳細的說明。

(29)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10。

(30) 吳宏明，〈殖民地教育をめぐって〉，《帝國議會と教育政策》（京都市：思文閣，昭和 56 年），頁 550。

初，預算的大部分是花在維持治安及建立產業經濟基礎結構上。加上當時駐臺日本官吏之道德品行低落與地方行政機構制度未能確立，以及臺灣稅收之根源——地租改正也無法一一實施，導致統治費用的徵收無著落，只好仰賴國庫補助。而為了臺灣經營的不善，當時松方正義內閣只好在日本內地進行增稅，卻因政策失敗而總辭職。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朝野各界不斷地追究臺灣總督府對於新領土經管不彰的責任。領有臺灣對於當時日本而言，被認為是一種浪費，而根據此理由，日本國會中甚至還盛行著希望用一億圓把臺灣賣給法國，或賣還給清國的論調。

在財政緊迫的狀況中，領有臺灣的初期，國語教育的創始者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38）不但實施了無償式的入學制，甚至為了獎勵新附人民入學，還給付就學者津貼。明治三十一年（1898）以後，公學校的營運費用來源中增加了臺灣居民的地方稅和捐獻金。然而由於「土匪」的武裝抵抗盛行，為數頗多的地區無法如期徵收地方稅，所以國庫補助臺灣的金額年年上昇。此時在野黨議員野間五造在國會中諮問，如果徵收不到地方稅時，政府要以什麼措施來解決教育問題。針對這個問題政府的回答是「期待以國費來掌理國語傳習所，以期國語教育之普及」。⁽³¹⁾結果，因為地方稅徵收不順的問題和新學校的大量設置，明治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1903-1910）間，有關公學校的經費還是增加了四倍。⁽³²⁾

領臺初期，這個新領地的統治費用經常是維持在英國統治下各殖民地的二倍至四倍。⁽³³⁾其統治費用高騰的原因之一，無非是日本擁有比英國更為積極的教育欲望和體制。而這種非經濟性的教育體制卻持續至昭和期。昭和十一年，蔡培火為了對抗國語教育而提倡臺灣話白話字運動並批判臺灣總督府說道：甲午戰爭後的四十年之間，臺灣總督府累計使用了約三億圓的教育費用，其目的僅僅為了培養二、三十萬的國語使用者。⁽³⁴⁾國語「同化」教育的非經濟性由蔡培火的言論中可見一斑。

(31) 吳宏明，〈殖民地教育をめぐって〉，頁 550。

(32) 持地六三郎，〈犧牲の精神〉，《臺灣教育會雜誌》，103 號（明治 43 年 10 月），頁 30-31。

(33) 〈カークート氏臺灣二關スル覺書説明筆記 第一回〉。

(34) 蔡培火，〈臺灣に於ける國字問題〉，《教育》4:8（昭和 11 年 8 月），頁 70。

(三)舉國意見近於一致的國語教育

臺灣的國語教育政策具有上述非經濟、不合理的特異性。然而這種統治的方針卻是受到日本國內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甲午戰爭後，帝國憲法到底適不適用於這個新領土，對於這個問題，在日本國內是存有相當大的爭議。領臺初期，臺灣的統治方針也因此經常孕育著矛盾和未確定性。不過在這種政策傾向中，推行國語教育卻以既定不動的態勢被許多人所遵守著。甲午戰爭後國語教育迅速地在臺灣各地展開，不論是將臺灣視為「內地的一部分」的伊澤修二，或是主張把臺灣當成殖民地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不管其真意如何，在公開場合都表現出贊成國語教育的態度。以日本語教育做媒介，把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的意見在日本的官場中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之認識，反對「同化」幾乎被認為是一種禁忌，只要提起就會遭旁人群起圍攻。⁽³⁵⁾

推行國語教育的熱忱不止於政府官僚，在民間也同樣為多數人所贊同。例如，於日本發行的雜誌《教育時論》(1885-1934,開發社)在明治二十八年五月(361號)至三十年三月(430號)之間，幾乎每期都刊載有關臺灣教育的消息、事項。其中除了多數的報導記事外，還包括了二次社論與二篇「學說政務」欄中的論文及數篇小論文。基本上這些論述都是以贊成實施國語「同化」教育為前提。⁽³⁶⁾明治三十四年(1901)，在臺灣則誕生了《臺灣教育會雜誌》，⁽³⁷⁾由其前身《國語研究會雜誌》之雜誌名稱可看出其創立之宗旨和目的無外乎是討論如何有效率地將國語普及於臺灣。由上述事實看來，臺灣的國語教育幾乎是在舉國意見一致的狀況下推行的。

(35)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頁63。

(36) 渡部宗助，《臺灣教育史の一研究》，《日本教育學會》36:3(昭和44年)，頁927。

(37) 明治31年9月國語研究會在臺北成立。以從事有關教育工作者為中心，盡力於國語相關的研究是國語研究會設立時的主要旨趣與課題。這也就是臺灣教育會的前身。明治34年2月，在召開國語研究會第2回總會時，會員平井又八等提出組織變更之建議，此建議被接受後國語研究會就改成臺灣教育會。於明治34年7月20日發行《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號。當時創刊之趣旨目的如下：(一)教育社群之意見發表，(二)教育學術事項的研究，(三)教育上重要事項的調查，(四)有關教育之講談會及講習會的舉行，(五)有關教育之雜誌的發行及教育上有益圖書的出版。創刊當初，雜誌是採隔月發行之形式，從明治35年10月開始變成月刊，明治45年1月號起改稱《臺灣教育》並持續發行直至昭和18年。參考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頁153、155。

和同時期的西歐殖民地或領臺前明治二十年左右的蝦夷與沖繩的「同化」政策比起來，臺灣的國語「同化」政策具有如此多的特異性。在同時代的橫座標中，嚴格地說起來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國語教育政策並不完全等於殖民地政策學上所謂的“assimilation”。而從日本近代史中日本對於異民族的語言政策的縱座標看來，臺灣的「同化」政策則具有先驅性。然而，具有這麼多特殊性的「同化」到底包括了什麼性質和內涵呢？對近代的日本而言，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而近代日本的國語又是如何誕生？它具有什麼意識形態呢？以下探討的就是這些問題。

四、「同化」的工具性、兩義性與流動性

(一)「同化」的工具性

就如同 Mark R. Peattie 所指出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同化」經常是以「完全相反的理由」被一些立場不同的官僚、政治家、學者、改革者所支持。⁽³⁸⁾事實上從領臺初期開始，支持「同化」政策的論者，通常是以支持臺灣人的平等化和庇護日本政府的差別統治二個對立的動機和態度在討論同一個議題，結果造成了「同化」概念的混淆不清。

大正三年（1914），鑑於世界情勢的變化且意圖向亞洲發展，自由民權運動長老板垣退助（1837-1919）及支持其理念的一些知識分子成立了「同化會」，主張盡速賦與臺灣人民權，改善在政治上、教育上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該會的手段就是催促臺灣總督府儘早實現「一視同仁」和落實「同化」政策。對於板垣而言，「同化」無疑地代表立即的平等化。也因為同意板垣對「同化」如此之見解，臺灣抗日運動家林獻堂、蔡培火等才加入「同化會」。⁽³⁹⁾然而，板垣所描繪的「同化」馬上遭到臺灣總督府的否定。其理由也同樣是基於「同化」。例如，當時擔任學務課長的隈本繁吉在反駁板垣時，其論據就是真正的「同化」「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可達成的，⁽⁴⁰⁾因為對於臺灣人所實施的「同化」還尚未完成，所以現階段的差別

(38) Mark R. Peattie 著，淺野豐美譯，《殖民地帝國 50 年の興亡》，《20 世紀の日本 4》（東京：讀賣新聞社，1996 年 12 月），頁 134-137。

(39) 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社，1971），頁 21、22。

(40)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て〉，《臺灣教育》，154 號（大正 4 年 2 月 1 日），頁 13-14。

待遇，雖不得已，但卻是合理的。

「同化」同時被用於支持平等化、差別化之例子不勝枚舉。大正八年（1919），臺灣總督府制定了臺灣教育令。不滿其內容的臺灣知識分子，以統治者打著「同化」、「一視同仁」之名卻行不平等待遇之實，嚴厲地批判「同化」政策的欺瞞性。而對於這些批判和攻擊，當時的民政長官下村宏辯解著說：「『同化』這個名詞其本身就已經代表了（實行者與受容者）能力程度上存有落差」，⁽⁴¹⁾他強調「同化」政策的實施本身就是日、臺兩民族間存在有文明高低、文化優劣的證明。所以既然實施了「同化」，就不可能立即撤除教育上的差別待遇。下村宏的結論是，即時賦與臺灣人等同於日本人的權利與待遇是不可行。雖然在公眾的場合裏下村極力宣揚「一視同仁」，但是和隈本一樣，他們兩人所展開的「同化」論的邏輯重點在於，要撤除不平等待遇，其條件就是必須縮短日、臺兩者之間文明、文化上之落差，其前提是必須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和不斷的努力。換句話說，「一視同仁」的實現是必須以臺灣人文明、文化的進步做為基準。在時間這個因素的前提下，就如同石田雄所指出的，平等與「民度」（人民的程度）成正比例關係，而「同化」教育就是達成平等化的必要手段和保證。⁽⁴²⁾

透過「同化會」等問題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同化」，一部分的統治者和臺灣人把他解釋為迅速的同一化、同質化，不過另一部分的統治者則認為「同化」充其量只是向臺灣人約定平等化會於將來實現而已。而既然平等化的實現不是在現在而在將來，所以現在所正在進行的差別統治只是暫時的現象。由此可看出對一部分的統治者而言，提倡「同化」的目的是要宣撫因實施差別統治而引起臺灣人或一部分統治者的不滿情緒，是消解臺灣社會上不安和政治衝突的一種工具。

臺灣既然是殖民地，為了換得平等，臺灣人被要求的「同化」時間只有恣意地被延長而從來沒有短縮過。這其實也意味著縱使臺灣順利地推行了「同化」政策，得到良好的成果，臺灣人還是永遠無法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和權利。在實際統治上，「一視同仁」的宣傳政策並沒有正確而合理地反映出經由「同化」臺灣社會進步的狀況。這說明了「同化」其實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是統治者為

(41) 下村宏，〈臺灣教育令に就て〉，《臺灣時報》，大正8年9月號，頁7。

(42) 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思想》，1998年10月、11月。

了應付臺灣人的反抗，方便其統治而大事宣揚的一種策略。而在統治者宣揚「一視同仁」以及被統治者不斷強烈地抵抗之下，「同化」所具有濃厚的工具性也就愈明顯。

(二)「同化」的兩義性

在一般先行的研究中，「同化」通常只被描繪成是精神上、文化上、情緒上的日本人化，在實施「同化」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剝奪了臺灣人的傳統與文化，因而「同化」經常遭到否定。然而，「同化」雖然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和工具性，但也並非如此就表示欠乏實質內涵。

明治二十九年(1896)，臺灣最早的國語教育機構國語傳習所在伊澤修二的主導下設立了。其設立趣旨如下：

本所雖然是以傳習國語爲主旨，但也經常注意道德的教訓和智能的啓發。道德的教訓是以尊皇室，愛國家，重人倫以培養本國精神爲趣旨。而智能的啓發則是以教育臺灣人經世立業所須之知識技能爲主。(43)

在一些研究中，國語傳習所經常被定位成一個傳授日本語與培養翻譯人材的機構，而忽視了伊澤也企圖利用國語向臺灣人輸入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道德與日本精神，並教授臺灣人「經世立業」時所需的知識技能。國語傳習所是具有過渡性質的臨時機構，但是其強調「智」也就是智能、「德」亦即是道德的教育精神在爾後一直被承襲。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大嵯坂公學校結業典禮上，該校校長淺井政次郎在題爲〈普通教育に就て〉(就有關普通教育而談)的訓辭中就明白地說道：

諸位雖然已經是擁戴萬世一系的皇統，東洋第一文明國的人民，但如果不了解本國之言語，不精通本國的情事，則如何去執行做爲本國臣民本分……現今不分本國人和臺灣人，首要之務唯是讓本島人浴沐於皇化，使其具有本國人之性格，並具備通達文明學識之事理，(中略)不管農、

(4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昭和14年，頁171。

工、商都逐漸要了解文明新智識。(44)

淺井政次郎在參與明治三十二年（1899）公學校規則制定時，也規定了「公學校是以教導本島人兒童國語，施與德育，以期養成國民性格，授與生活上所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為主旨」。(45) 在此具有高度實學性質和因應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合理性與啓蒙性思考的「智」和象徵著日本精神和天皇制國家秩序觀的「德」，兩者的輪廓更趨明確。而事實上，並不只限於明治期，包括大正期和昭和期的各個時代，幾乎所有有關國語教育的法規、言論都幾乎一定會提到「智」、「德」這兩個主題與概念。所謂的「同化」，其實是由「智」、「德」所支持著，亦即其具有兩義性。

有關「智」、「德」兩個概念，又是如何具體反映在「同化」教育上？而「同化」中兩義性的概念在反映於國語教育中時，其比例分配的情形又如何？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具說服力的方法便是分析各時代國語教科書中的內容。因為統治者實施國語教育的終極目標既然是要「同化」臺灣人，因此必須製造或維持一個提昇臺灣人文明與文化程度，以便將來讓臺灣人享有與日本人同等權利之統治形象。所以國語教育的內容就必然會超越語學的範疇，而有某一個程度的實質內涵。而這個內涵是不可能與「智」、「德」無關的。

(三)「同化」的重心移動——「同化」的流動性

1. 國語教科書中「智」、「德」教材比例的流動性

根據蔡錦堂的分析調查來看，使用於明治三十四年至大正二年間（1901-1913）的《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其合計十二冊 183 課當中，「天長節」、「紀元節」、「皇宮」、「臺灣神社」、「仁德天皇」、「醍醐天皇」、「明治天皇」、「日本的地圖」、「我國」、「國旗」、「我國的歷史」、「黃海之戰」等關於皇室、國家、日本人的精神、價值觀之課，亦即是國語規則中所言及有關「德」之文章共有 15 課，占有 8.2%。相對地，「郵便」、「火車」、「水蒸氣」、「電氣」、「醫生」、「衛生」、「鼠疫」、「人體」、「商人」、「紡織」、「博覽會」等具有高度實學性的教材，介紹近代文明和因

(44) 淺井政次郎，〈普通教育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2 月 2 日。

(45)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71。

應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合理性與啓蒙性思考的課文則占了 68 課，37.2%。而有關地理、博物、物理、化學、科學等內容之課文占了 56 課，30.6%。童謠、寓言、遊戲等則有 27 課占了 14.8%。⁽⁴⁶⁾ 和有關「德」的 15 課比起來，「智」的教材大約是其十倍左右。

不過，同樣是蔡錦堂的分析調查中顯示，大正二年至大正十二年間（1913-1925）使用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其教材量比前期的教科書增加了 12 課。但是有關科學的知識，近代的生活的教材卻比前一期教科書少了 64 課，合計只有 60 課占了 27.3%。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裏隨著修身科課程的設立，領臺初期依附在國語課程中的德育之任務照道理說應該大幅減輕才對，實際上有關皇室、國家之內容卻反而增加了 9 課。⁽⁴⁷⁾ 又根據何義麟所做的調查，隨著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爆發，昭和十七年（1942）發行的《國語讀本》中，強調近代化或西洋文明的教材更是大幅減少，而介紹日本精神、皇室制度、軍國主義、建國起源、歷史故事、俳句、和歌等日本文化的課文則隨之大為增加。⁽⁴⁸⁾

「同化」既然具有兩義性，其比例分配在各種變數的影響下是不可能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內外局勢的變化、政策擔當者的更迭、臺灣人接受國語教育的反應，教科書的內容是經常會做調整，其分量、內容也會隨時改變的。整體而言，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國語教科書中，有關近代文明的教材比例是隨著時代變遷而呈遞減現象，介紹日本精神、皇室制度、軍國主義的課程則反而是節節上昇。「智」、「德」教材的比例大致上是有相互逆行的現象。⁽⁴⁹⁾

(46) 蔡錦堂，〈日本據臺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7月），頁241-244。

(47) 同上註。

(48) 何義麟，〈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7（1986年12月），頁80-81。

(49) 周婉窈曾於〈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臺灣史研究》4:2中分析第三期公學校（大正12至昭和5年）的國語教科書之內容，其所得到的結果是這本共有300課的教科書當中有關實學知識與近代化之課程有68課約占全體課文的22.7%。相對地與天皇、愛國教育、日本歷史文化、地理內容有關的課程有57課，約占19%，而敘述道德的課程有46課，約占15.3%（所占百分比之部分由筆者根據原作者的數字計算）。雖然周婉窈所做的課程分類方法、定義與本論文所引用蔡錦堂、何義麟的不盡一樣，但其中有關實學知識與近代化之課程與本文「同化於文明」的定義幾乎相同，而天皇關係、愛國教育、日本歷史文化、地理及道德的課程之分類較接近於「同化於民族」。因此如果以半世紀中整個教科書編纂的走向來觀察，並容許某一程度的誤差的話，與前期（大正2-12年）的教材中「同化於文明」的比例27.3%比起來，第三期的22.7%還是呈現了下降的趨勢。

2. 做為差別待遇之理由時「同化」的流動性

「同化」除了擁有兩個會流動的內涵之外，也是達成平等化的手段和保證。也因此在做為平等化之根據時，「同化」的重心也應該是會有移動的可能。在此補充說明一下。「同化」在被拿來做為差別統治之合理化道具時，並非一開始就與「智」、「德」兩者都同時扯上關係。其實把「同化」當做「一視同仁」的實現條件之始作俑者是後藤新平（1857-1929）。領臺當初，後藤為了對付反對「六三法」延續法案的政敵時，主張對於「民度」不一樣的人實施同一政策是愚舉、暴政。⁽⁵⁰⁾他認為，尚未步入文明化的臺灣，其施政應該要以其社會進化的程度做為基準。後藤在強調臺灣人「民度」落後時，主要是把重點放在近代文明，也就是「智」上面。也因此，後藤數次表示臺灣，尤其是所謂「蕃界」的進化狀況有如「太古時代」，其用意就是在於賦予臺灣的差別統治正當性。⁽⁵¹⁾爾後這個統治策略一直被援用，成為反對「一視同仁」的主要理論。例如，明治三十二年（1899）四月二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的社論〈同化之方針〉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社論中說領臺之後「基於人種的不同而訂定之新法典只是一時的便宜之計，以『六三法』之存在為根據來證明同化主義已從臺灣統治中消失是錯誤的判斷」，「只要土人（按：臺灣人）的智力、體力達到優秀的水準，我們不排除實施同化合一之政治」。⁽⁵²⁾還有明治四十三年（1910），臺灣銀行的理事梶原磯辰於《臺灣》第1號發表的〈臺灣の過去及將來〉一文中曾明言，「〔臺灣〕在十年以前是南部荒廢的新領土，完全是一瘴癘的異域，然我等以民族之力量遂能把此南部荒廢、瘴癘之地化為今日之樣子。（中略）因而開發本島人的智識，應該能把其他有形無形之事物同化成功，殖民地不應該永遠是殖民地，如果將來臺灣社會的情態能進步到和本國同樣程度之時，將以本國的領土之一部分看待之。」⁽⁵³⁾《臺灣日日新報》的社論和梶原的論文之邏輯與後藤同出一轍。對他們而言，將來臺灣社會和內地共享「一視同仁」之條件是本島人的智識之「同化」的成功，在此日本人的精神、道德與價值觀並沒有特別被提起或強調。

(50) 後藤新平，〈最近殖民政策〉，《同志社時報》，115號（大正3年12月），頁2-3。

(51) 後藤新平，〈赤十字社事業に就て〉，《後藤新平文書》24-6-8（明治38年4月25日），頁119。

(52) 〈同化の方針〉，《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2年4月28日。

(53) 梶原磯辰，〈臺灣の過去及將來〉，《臺灣》，第1號（明治43年），頁15-18。

不過，到了大正期以後，臺灣人的「民度」明顯地提高，反抗不平等的聲浪也隨之高漲。此時爲了牽制臺灣人平等化的快速實現，廢除差別待遇的根據也就隨之增加了道德情操上的因素。隈本繁吉在反駁板垣退助的前述論文中說過：

思考淺薄者認爲只要有錢有智識，在形式上和內地人過同樣的生活，就可獲得與日本人同等無差別之待遇，然而，這是大大的錯誤，如果要平等，除了這些之外，還要具備身爲母國人國民，和日本人完全一樣的國民精神。(54)

隈本不否認臺灣人在文明上有長足的進步，但也就是因爲如此，爲了延長平等化政治的實行，隈本在提出臺灣人「一視同仁」的條件時，也就加上了「風俗習慣」、「體會大和（民族）之心」、「內地人的精神」等要求。同樣的情形在下村宏的「同化」構想中也可看見。大正八年（1919），在針對臺灣知識分子因不滿臺灣總督府制定的臺灣教育令內容而提出一些批評時，下村一方面辯解「『同化』這個名詞其本身就已經代表了「〔實行者的日本人與接受者的臺灣人〕能力程度上存有落差」，也一面具體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人達成平等化的條件。下村說道：

大體上而言，同化就是必須先努力於體會、獲得身爲日本國民之精神。因此，同化的意義不能單從形式上來看，也不應該只急進於從事外形上的改造。必須經年累月地去熟習國語，醇化風俗習慣。(55)

和隈本一樣，下村提出實現「一視同仁」的條件不光只是「外形上的改造」，而是透過學習國語之手段去體會、獲得「身爲日本國民之精神」。從後藤、梶原、隈本與下村的言論看來，差別統治的正當化論理從「智」移向「德」的傾向頗爲明顯。這說明了伴隨著「智」、「德」教材比例的消長，「同化」在做爲合理差別待遇之工具時，其重心也是會轉移、變化的。

(54)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て〉。

(55) 下村宏，〈臺灣教育令に就て〉。

五、從日本的近代史看「同化」和國語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二月，當時以陸軍為主要成員的團體學友會向兒玉源太郎總督提出了題為〈臺灣經營策〉之論文，開宗明義就說「對於臺灣我們必須大大地開發其智德」、「讓其在進入文明的領域之同時，同化於我國之國體，以期和我國進取之大義同行一致，變成我大和民族」。⁽⁵⁶⁾ 很明顯地，對學友會而言，「同化」不但是與「智」、「德」有深切的關係，而有關「德」的實施則具有把臺灣人「變成我大和民族」的意圖。這樣的意圖在各時代的「同化」脈絡中都可以觀察到。例如，大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對直轄學校校長會議的訓示中，當時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對臺灣的「同化」方針做了如下之說明：

本來，新領土的同化大業就是要薰陶新附之民使其與母國的文明渾化融合……體奉教育勅語之趣旨，實行民族同化之時務，在去除弊害，涵養良俗時讓新舊的人民能渾然成爲一體。⁽⁵⁷⁾

田健治郎的「同化」概念，也和學友會一樣地包含了「同化於（近代）文明」與「同化於（日本）民族」（以下簡稱「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兩個主題。因應「同化」的內涵與目標，且把它放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社會潮流中來解析的話，「同化」是可以把它再細分成二個分析概念。那就是「同化於民族」和「同化於文明」。

（一）作為分析概念的「同化」——「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

前面已經說明過，以各時代有關「同化」的論述及國語教科書的內容來分析，「同化」中的「智」、「德」主要是包括爲了因應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滲入的科學性、合理性、啓蒙性的西洋思想和以介紹天皇制思想、日本歷史、日本獨特的精神、價值觀等，亦即是以日本文化爲主的概念。這兩種內涵正好都反映了近代

(56) 松本龜太郎、滝野種孝，〈臺灣經營策〉，明治31年12月13日，R30-78。

(57) 〈田總督の訓示〉，《臺灣教育》，212號（大正8年12月）。

日本歷史的發展軌跡，與日本帝國的形成脈動是相契合的。

西川長夫曾在其多篇論文中說明了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在近代日本歷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西川指出文明、文化的觀念同是起源於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文明的概念象徵著都市、未來、人類的進步、啓蒙主義及普遍性，先是在法國與英國等當時的先進國家中盛行。而文化的概念則興起於德國、俄羅斯等當時較為後進的國家，代表著鄉村、傳統與過去以及人類的個別性、精神上的優越性與獨自性。文化、文明之概念在形成之際都是立於同一線上批判當時的宮廷、國家。爾後爲了護持各國自身的利益，這兩個概念逐漸變成了對立關係，並成爲發展不同類型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對於德國、俄羅斯強調自己國家成立的根據是其民族的古老、血統的純正、傳統文化的優越性，英國、法國等則標榜其國家形成的主軸是在於人類之進步、啓蒙、普遍性的存在。結果，兩者間形成了「文明——國民」、「文化——民族」的組合概念。

「文明——國民」與「文化——民族」這二個組合概念卻在稍後先後投射在日本這個新興國家的形成、發展的軌跡上。西川長夫認爲，以「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爲主要目的的明治維新其實就是「文明化」。但是由於當時日本政府過度強調攝取西洋文明的重要性，致使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日本國內出現了以保守知識分子爲主，以保衛自己的傳統文化，強調大和民族精神上、心性上之優越性爲訴求的反彈現象。而讓日本逐漸走向民族國家之路。⁽⁵⁸⁾

其實，在明治二十年前後日本語當中並沒有「民族」這個名詞的。明治二十二年，基於天皇制國家原理所制定的帝國憲法頒布時，並沒有將日本的人民定位成「民族」，而只視之爲所謂的「臣民」。⁽⁵⁹⁾「民族」這兩個字開始被一般人所普遍認識與接受是在文化這個概念開始於日本普及的十九世紀後期。明治二十三年（1890）教育勅語誕生後，⁽⁶⁰⁾日本逐漸興起了德國浪漫主義式的民族觀，把民族

(58) 西川長夫，〈國家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文明と文化〉，《思想》，827號（1993年5月），頁4-33。

(59)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39-50。

(60) 「教育勅語」之正式的名稱爲「教育に関する語」（有關教育的勅語）。發布於明治23年（1890）的這個勅語是近代日本的教育基本原理與最高準則，同時也是日本統治下臺灣教育的最高準則。教育勅語與帝國憲法並稱爲日本國體的二大聖典。帝國憲法掌管人民的行爲規範，教育勅語則是控制人民的精神道德和思想。「教育勅語」的內容一方面敘述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以萬世一系的天皇之「德」在統治日本，強調日本這個國家的國體是舉世無雙、萬古不易的。一方面則具體揭示了日本國民所應該遵守的各種精神

(Volk) 視為是擁有共同血緣、語言、文化和精神的集團。爾後，隨著這種原初主義式的民族國家觀的盛行，所謂的單一民族思想觀以及「國體論」、國粹主義也隨之抬頭。而此時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占領了臺灣。

把文化、文明的概念放在日本近代化過程的脈絡中來透視「同化」問題時，可明白地看出日本在占領臺灣時其正邁向民族國家的路途中，也由於這種本國歷史過程的投射，統治者對於臺灣經常交雜著兩個視線，那便是「文明」和「民族」。因此雖然沒有經過嚴密的檢證，西川長夫信心十足地認為，日本人對文化、文明的接受態度不但影響了國家的形成，並在爾後強烈地反映在其殖民地統治的意識形態及發展上。⁽⁶¹⁾ 而正如同西川所言，在臺灣統治的「同化」概念中，明顯地潛伏著「同化於文明」及「同化於民族」的意圖和視線。學友會的〈臺灣經營策〉和田健治郎總督的訓示中的「同化」觀，無疑地反映了日本近代史的脈絡，可說是其來有自。

(二)「同化」的最主要手段——國語教育

前文中提及日本最早在「同化」蝦夷和沖繩的居民時，並沒有立即採用積極的國語政策，而統治臺灣時則不然。何以在領有臺灣後，日本的異民族語言政策會有這麼明顯的改變呢？其實這個道理頗為簡單，因為制度上日本的國語正式成立於甲午戰爭後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在此之前，日本各地的語言不但南轅北轍，就連書面語與口語也幾乎呈分離狀態，而無法「言文一致」，更沒有所謂的國語。

根據長志珠繪的研究，日本近代史中制度上的國語是成立於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小學校令改正之時。當時文部省把原本定為讀書、作文、習字三科目整合成爲一門「國語科」，並正式編入初等教育課程中。在這個時點，以國家行政做後盾的國語教育才算正式成立。此前日本的初等教育科目中是沒有「國語」這門科目的。非但如此，有關所謂國語的公定內容，也就是說其標記方法與發音等到底要

道德項目。「一旦緩急，義勇奉公」之項目，爾後成爲戰爭期間被軍方利用來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的道德規範。「教育勅語」融合了儒教思想和近代日本的家族國家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直支配了整個日本帝國的政治、社會、教育，直到昭和 23 年（1948）才失去效力。

(61) 西川長夫，〈國家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文明と文化〉。

以什麼做為基準，各界眾說紛云，意見無法統一。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尋常小學校讀本編纂趣意書才明確地把國語的發音標準化，以東京中流人士使用的音調做為基準。換言之，領有臺灣前，日本只存有觀念上的國語，制度上的國語之輪廓是不明確的。這樣的情形一直到甲午戰爭結束九年後，明治政府才以依照臺灣總督府所制定的內容方針，完成日本「內地」國語的定型化和制度化。占有臺灣促使日本政府和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把「國語」從觀念、構想上的範疇迅速推進到行政制度的軌道上，並賦與公定的內涵。⁽⁶²⁾

其實在江戶期間日本就開始出現「國語」這兩個字，明治初期所謂國語國字論爭中，「國語」這個用詞也經常被使用。然而此時期所謂的「國語」只是思考上、主張上、議論上的階段性用語，定義極不穩定，所指的內容也與本文中所論述的——擁有具體內涵，並成為國家制度中之一環的「國語」並不相同。由上可知臺灣這個新領土在國語誕生的過程中所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1. 具有「同化於文明」意識形態的國語

慶應二年（1866），建立日本近代郵務制度的前島密發表了〈漢字御廢止之議〉一文，揭開了一連串國語國字論爭的緒端。文中前島提起，為了「日本的文明化」、「國民教育的普及」、便利「無知蒙昧」的民眾攝取學問，日本須要擁有「盡量簡易的文字文章」，為此必須廢止「不合理」、「沒效率」的「漢字」。⁽⁶³⁾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前島文中提及的學問指的不是江戶時代中被奉為知識主流的儒教思想，而是指西洋文明。〈漢字御廢止之議〉的出現象徵著西洋文明取代了儒教，成為日本人心知識、進步、學問的定義及學習模倣的對象。

明治二年（1869），南部義壽向土佐藩政府提出了名為〈修國語論〉的建議書，主張「借用洋字來修國語」，成為主張羅馬字國字論的開端。明治四年（1871），擔任公使的森有禮在美國發表了有關國語的論文，文中他批判日本語是「無法通用於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並提倡所謂的「英語採用論」，主張廢除日本語。明治六年，明治維新時著名的啓蒙雜誌《明六新誌》的創刊人西周也發表了以羅馬字來標記日本語的意見，明治十七年，爾後當了文相的外山正一等人創立「羅

(62) 有關日本近代史中、國語如何被形成，這方面的問題可參考長志珠繪，〈教化と文化の間——「國語」問題と領臺初期〉，《文化交流史研究》，創刊號，頁75-102等論文。

(63)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の國語ナシヨ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10年11月），頁28-29。

馬字會」。此時，有關國語國字問題的議論與運動開始體系化，其影響也從政界波及至文學界。(64)

有關國語國字問題的議論，主張頗為豐富，大概包括了漢字廢止論、漢字保留論、羅馬字運動、假名運動、新文字論等。而支持這些論爭的共同觀點之一就是「同化於文明」。近代日本爲了攝取西洋文明，並將之普及於大眾，必須翻譯大量西洋的著作，其間便引起了日本知識分子對於語言改革的論爭。除了所謂「言文一致」的問題之外，論爭的重點之一在於如何創造一個能有效、正確、迅速地攝取並普及西洋文明的語言系統。也就是說在上述改良日本語的主張中，主要的焦點是在於語言的效率、大眾性與便利性。對於這個議題，多數人認爲表意文字的漢字筆畫繁雜，是近代化的障礙，言語上的「殘障者」。而表音文字的假名雖較爲便利、進步並具有「言文一致」的大眾性和便利性，但在攝取西洋文明時的效率不及羅馬字。(65) 經過長期的討論後，日本人大量減少漢字，增加假名而成爲爾後的國語。而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國語除有「言文一致」及統一溝通國內各地方言的功能外，還被賦與了強烈的意識形態，那就是國語具有攝取西洋文明的功能，是「同化於文明」的手段與利器。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甲午戰爭前後，保守派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已經預測清日之役日本勝算在握，因此開始發表了一些文章，主張不能大量廢除漢字，其理由就是領有臺灣後，漢字將有助於統治新領土。日本在確立近代國家之形態時，臺灣是完全與之無關的。然而在其國語誕生之際，日本是把這個新領土也當做一個要素去做考量的。換言之，日本在統治臺灣時，絕對不是一開始就拿一個已經固定成形的國語去進行「同化」政策。在有關國語的議論過程中，臺灣是在同一時空之下與內地密切互動，左右即將誕生的國語之內容。(66) 而在這樣的時空架構下，國語還具有另一個意識形態，那就是「同化於民族」。

2. 作爲日本人精神血液的國語

西川長夫在說明「文明—國民」與「文化—民族」這個組合概念時，曾指出

(64) 有關國語國字問題之討論請參考石井莊司，《國語教育叢書 19 近代國語教育史》（教育出版センター，昭和 58 年）；平井昌夫，《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昭森社書，昭和 24 年）。

(65) 安田敏朗，《帝國日本の言語編制》（橫濱市：世織書房，1997 年 12 月），頁 19。

(66) 長志珠繪，〈教化と文化の間——「國語」問題と領臺初期〉，《文化交流史研究》，創刊號（1997 年 5 月），頁 75-102。

明治時期，由於過度強調西洋文明的重要性，而導至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的危機感，引起了保衛傳統文化、強調大和民族精神上、情緒上之優越性之思想的抬頭。西川所指出的反彈現象在國語的創造過程中表露無遺。明治中期，爲了對抗以西洋文明化爲中心思考的語言改革主張，當時的文部大臣井上毅和以國文學者兼「歌人」的落合直文爲首的文化人，如小中村義象、高津楯三郎、荻野由之等，開始在各自的專攻領域中提倡日本語的民族主義和復古主義。這些立足於文化思想的活動在不久後，逐漸形成了強烈的語言國家主義。而集這種主義與思想之大成，並將其推廣到一般大眾的就是日本國語教育先覺者的語言學家上田萬年。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上田萬年（1867-1937）經由帝國大學評議會派遣留學德國，明治二十七年（1894）歸國後上田就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講座的第一代教授，成爲制定近代日本語言政策中最重要的人物。甲午戰爭勝利前，上田萬年發表了日本近代史上重要的演說。在題爲〈國語と國家と〉（國語和國家）的演說文中，上田萬年首先強調日本這個國家是由天皇爲首的單一民族所組成的「血統團體」，和西歐各國比較，基於「君民同祖」、「忠君愛國」的日本「國體」具有顯著的優越性，接著上田又說了以下一段著名的話：

語言（依照上田萬年演說的文脈來看，其所說的「語言」指的是國語）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按：此處的「同胞」是指從同一母親身上出生，擁有相同血統的兄弟姊妹），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⁶⁷⁾

上田萬年強調國語的神聖性，認爲其權威不可侵，不可批判，並把日本語比喻做「日本人的精神血液」、「國體的標識」、「情深無比的母親」、「祖先的遺產」，藉此上田把甲午戰爭中的日本定位在所謂「一個國家·一個語言·一個民族」之三位一體的國家框架中。上田這種一面贊揚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一面卻承認日

(67)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明治文學全集 44》（東京：筑摩書房，昭和 43 年），頁 108-113。

本國內擁有許多非大和民族的說詞，看似相互矛盾，卻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上田認為這些異民族都已經被「鎔化」成日本人。演說中上田對於以往這些異民族如何被「鎔化」成日本人，即日本人以何種方式達成「同化於民族」這個問題著墨不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發表這篇演說時，上田提出了一個更加強烈的「鎔化」手段，那就是國語。

以上田萬年的理論來說，語言對使用的人而言既然是精神的血液，「國語」當然就是循環於國家這個身體內的血液。因此，如果居住在日本全國的人民都學習並使用國語的話，日本這個國家的純血化便可以達成。縱使在日本國內存有非大和民族的分子，只要讓他們使用國語也就可以統一流在他們身體內的「精神血液」，輸入「忠君愛國」的思想，將他們「鎔化」成日本人。以此在觀念上，就可以自圓其說地來維護基於擬血緣制國家原理而成立的「國體」。在此，國語成為「同化於民族」的主要手段。⁽⁶⁸⁾

上田萬年在演說的結尾中提起了臺灣在經由甲午戰爭後勢將成為日本的領土。由這一段話可推測身為官僚學者的上田在提出這個可以讓異民族統治和擬血緣制國家原理並存無礙的國語觀時，其明顯地已經把臺灣放在思考座標上。進一步來說，上田萬年在甲午戰爭勝利在握的前夕發表這篇演說，其目的是為即將擁有海外領土的單一民族國家原理預先留下一個退路和空間以維護其優越「國體」的完整性。而事實上爾後上田的語言觀投影在臺灣的「同化」教育政策上，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⁶⁹⁾

日本在經過了一連串國語國字論爭後，國語不但被認為是攝取西洋文明與實行富國強兵的手段，並成為理解日本傳統精神與涵養其國民性格的最佳道具。就如同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臺南師範學校國民學校研究會所編的《國民科國語》中所說的，「不是因為身為日本人才說日本話，而是因為說了日本話才成了日本人。」身為大和民族的方法和根據除了是擁有相關血緣之外，最主要的還必須使用日本話。⁽⁷⁰⁾ 這種基於上田國語思想的邏輯操縱使得日本人、大和民族和血緣關

(68) 陳培豐，〈近代日本の國體イデオロギーと臺灣の殖民地統治〉，頁16-37。

(69) 同上註。

(70) 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國民學校，《國民科國語》（臺南：臺南師範學校國民學校研究會，昭和16年4月）。

係的定義從先天轉向後天，成為當時臺灣統治的主流價值觀。而國語中包含的這種「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之意識形態的成形，剛好就在領有臺灣的前後。在這種共時性的狀況下，「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不但可做為國語創造過程中的分析概念，同時這組分析概念也適用於臺灣的國語「同化」政策。

六、「同化」的要因——近代日本的「國體論」

在論述國語的誕生之後，讓我們把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政策再重新反芻一次。前面已經提過「同化」包含了以文明及文化為基礎的內涵，通常被當做不平等待遇的合理化道具並負有把臺灣人變成大和民族的任務。基於「同化」的功能與任務，我們可以理解既然「一視同仁」的實現是和臺灣人的「同化」程度成正比，而被約定於不特定的未來。因此為了製造或維持一個把無知蒙昧的臺灣人導入高度的文明與文化之中以迎向平等化，亦即是建立臺灣統治中「走向日本民族」與「走向『一視同仁』」的形象，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統治者是有實施「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的必要。而以國語的創造過程和歷史的脈絡來看，國語既然是吸收西洋近代文明的利器和日本人精神上的血液，那麼實行兩個「同化」最適當的手段無疑的是國語。因為，和服裝上、姓名上、習慣上的同一化以及通婚比起來，國語具有更多可以解決「走向（日本）民族」與「走向『一視同仁』」等問題的功能，並可以充分表達日本政府希望把臺灣人帶到近代文明之境界的企圖與決心。因此，為何日本統治下的「同化」政策必須強烈地執著於國語教育之實施，其道理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殖民地統治中差別待遇是常態也是前提。沒有實施平等待遇的殖民地比比皆是，臺灣並非特例。再者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甚至實行同化政策的法國，也從來沒有要「同化」其統治下的「原住民」成為法國或英國民族的跡象。為何單獨日本有必要為了要掩飾其統治下臺灣的「非一視同仁」、「非日本民族」的印象而花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冒著治安上的危險，甚至逆轉了世界殖民地統治潮流，改變自己傳統上統治異民族的方式，而舉國一致地去實施「同化」政策呢？對於日本為何必須堅持實施「同化」的動機與背景，我們還是沒有得到解答。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已經略為提到的「國體」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

(一)近代日本的「國體論」

「國體」這兩個字本身是漢語，最早出現在管子「君臣篇」，是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也就是說基本上具有國家組織之意思。⁽⁷¹⁾近世以後，「國體」這個名詞經常出現在日本，其用法與管子「君臣篇」大同小異。然而隨著時代的不同，有關國體的解釋與用法時有變化。不過明治維新後，其主要是用來討論日本的建國原理與國家的形態。所以其概念雖然曖昧，但給人之印象總是尊嚴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國體本身是一個普遍性的概念，世界各國都擁有自己的國體，而日本人之所以對於其國體擁有強烈的感情，乃是因為包括主政者之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日本的國體是世界上絕無僅有、優越無比的。基於這種幾近宗教信仰的狂熱及本質，在本論文中，筆者把日本國體定義成，以天皇制國家原理為中心，具有擬宗教式性質的近代日本政治文化。而就像政治學者後藤總一郎形容的：

在日本近代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像「國體」這樣的名詞和概念，能緊緊地把日本的近代束縛在黑暗當中。換言之，近代日本的形成，亦即是「國體」概念之創出、形成、實體化、肥大化的歷史。⁽⁷²⁾

1.「一視同仁」和擬血緣制之國家觀

國體雖然是支持及左右近代日本政治運作之主要動力，具有莊嚴古老之印象。不過國體這個思想概念是典型的「被偽造之傳統」，是被贊美成為「萬世一系」、「君民同祖」、「忠君愛國」、「一視同仁」、「萬古不易」、「金鷗無瑕」的傳統；而它普遍被一般民眾所接受其實是明治中期以後的事。明治二十年代，所謂國體二大聖典也就是明治憲法和教育勅語出現後，在政治上由於有國家大本憲法的規定，社會上則有教育勅語之奉讀，家族國家觀盛行，學校中開始實施修身教育，這些都助長了國體這個概念的普及化、制度化、具體化、日常化，讓其逐漸滲透到日本各地。而討論有關國體之問題，或用國體的角度來探討時勢之論述，

(71) 長尾龍一，《日本國家思想史研究》（東京：創文社，昭和 57 年 6 月），頁 12。

(72) 後藤總一郎，〈國體論の形成——その思想史の祖型——〉，《歴史公論》，1997 年 8 月號（雄山閣出版），頁 69-75。

成爲所謂的「國體論」。(73)

甲午戰爭前後，就是「國體論」鼎盛期的開始。而這種風潮則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向盟軍所做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能護持國體。國體對於日本人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然而，日本近代史中的「國體論」，其主要的內容與議題是什麼？綜合許多跡象，我們應該可以將之歸類成(一)宣揚「君民同祖」、「萬世一系」、「忠君愛國」所象徵的擬血緣制之國家觀；(二)討論「一視同仁」的政治形態。有關擬血緣制的國家觀，在論述國語思想時筆者已經做了一些說明，在此不再贅言。而所謂「一視同仁」，主要的意思就像大正十一年（1922）《太陽》第28卷8號所刊登的「國體」特集中一木喜德郎所說的：

在日本，天皇陛下是現神。而確實如此……天皇對於其下的子民，絕對沒有誰是憎惡，誰較可愛之分……不論在何處，天皇像太陽的光芒般地一視同仁，公平無私。這是三千年來天皇家族的境遇、遺傳……我們深信，對於所有位居國家上方的政治家者，其最重要的德治就是一視同仁、公平無私。(74)

一木喜德郎是當時的帝國大學教授，曾任第二次大隈內閣文相，爾後又擔任宮內相並且是日本著名法學者。而從他的敘述中明顯地可以看出，「一視同仁」的政治形態是延伸自擬血緣制的國家觀。不但如此，其與近代日本的義務教育制度，也就是教育機會均等主義的形成也有密切的關係。根據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鯖田豐之在〈日本の平等主義の功罪〉（日本式平等主義的功過）所說的，在近代化的出發點上，日本幾乎在各個領域裏都落後歐美各國。不過在義務教育制度的樹立上，日本和歐美各國可說是比肩並進。其原因與「一視同仁」的政治思想有深切的關連。(75)

(73) 陳培豐，〈近代日本の國體イデオロギーと臺灣の殖民地統治〉，頁18、19。

(74) 一木喜德郎，〈皇室と冊民の精神的連鎖〉，《太陽》28：8（大正11年），頁164-169。

(75) 鯖田豐之，〈日本の平等主義の功罪〉，《教育と文化》（神奈川縣立教育センター所報，1969），頁16-23。

江戶末期，因受到封建式身分階級制度之影響，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典型的複線型，庶民人家所就讀的學校的寺子屋、私塾和武家學校的藩學、鄉學是隨著身分階級而分別設立，是無法越過階級相互融通就學的。然而，明治維新後不管上層階級或下層階級、富有家庭或貧窮人家，其子弟都被安排在同一個教室鄰座學習。基於士農工商的身分階級制度而形成的不平等教育制度之所以能順利廢止，取而代之的四民平等之新社會秩序之所以能迅速滲入日本各地，主要的原因是明治政府巧妙地運用了擬血緣制國家原理。具體地說，以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總本家、現神（あきつかみ），⁽⁷⁶⁾且日本國民之間相互擁有血緣關係為號召，強調不管武士、農民、商人、工人等只要在天皇之下全國國民都同樣是赤子，都有享受「一視同仁」的恩澤之資格。在這個新的國家統合原理之下，複線型教育制度名正言順地改成單線型，並成為平等主義式初等義務教育制度之基礎。而在利用與貫徹這種齊頭式平等之同時，明治政府則把有關天皇制國家思想與國體之精神等也透過學校「一視同仁」地灌輸到兒童的腦裏，以進行「同化於民族」與「同化於文明」，強固其家族國家式的國民統合。⁽⁷⁷⁾

2.「國體論」與「同化」

近代日本的國家原理是架構在同一血緣關係上，利用血緣關係的同一性來打破階級，強調團結。擬血緣制國家原理與「一視同仁」的政治體制其實是一體兩面，兩者之所以會成為「國體論」的主要論述，是因為具有相輔相成之作用的緣故。然而，用血緣關係的有無來做為實施平等待遇的前提和條件，這種國民統合原理雖然促進了大部分日本人的團結，但並沒有完全解決近代日本的所有政治與社會問題。因為在江戶時期日本社會中存在着由士、農、工、商等所形成的封建社會階級，各階級的社會地位、待遇是不平等的。近代日本的政治家運用了擬血緣制國家原理——也就是把武士、農民、商人、工人等都視為是天皇的赤子。因此不管其是什麼階級，在同樣都是天皇的赤子之理由下，每一個人都有享受「一視同仁」恩澤之資格——雖然在某一程度下消除原本建構在階級上的差別現象。然而，這種把平等待遇的前提建立在血緣關係的同質性上的做法，並沒有完全解

(76) 所謂「現神」（あきつかみ）中的「あきつ」的意思是「現實的」，「あきつかみ」之全意就是在現世中展現之神明的意思，是對天皇的形容與敬稱。

(77) 鯖田豐之，〈日本の平等主義の功罪〉。

決國內不平等的問題。(78)

因為，事實上日本的單一民族論是虛構的，雖說為數不多但日本國家內存在著所謂的少數民族。這些包括了蝦夷等異民族，因為被認為血統上有異於大和民族之故，所以經常被排除在「一視同仁」的適用範圍之外，而形成了「走出（日本）民族」，「走出『一視同仁』」之現象，造成國體上的破綻、瑕疵及不平衡。為此，近代日本對於異民族經常存有非常敏感的反應和看法，「國體論」中時常會出現討論異民族的文章，其宗旨與目的經常都是居於爲了要維持國體的平衡，彌補其破綻。前述中上田萬年把日本的國語比喻成「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與「國體的標識」，其目的也就是要維護國體的存在。同此道理，「同化」這個概念之所以會出現在日本政壇上，其實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動機和時代背景。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史上第一本字典《言海》，以及明治二十五年(1897)山田美妙所著作的《日本大辭書》中都沒有刊錄「同化」這個名詞。對於原本是生物學上的譯語之「同化」這兩個字，當時的民眾本來是相當陌生的。然而，明治二十年代裏，由於日本在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後發生了內地外國人雜居的問題。當時居住在日本各地的外國人，其血緣與日本人不同，其享受到的權利也不全然一樣。換言之，內地外國人雜居之事實觸發了「國體論」中最敏感、最脆弱的兩個問題——日本領土中管轄異民族和存在非「一視同仁」之政治現象。而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議題時，依附著國體問題的「同化」一詞開始頻繁地被使用，而流行於知識分子、文化人、政治家之間。例如明治二十四年(1891)日本著名的哲學家，《國體衍義》之作者井上哲次郎在討論內地雜居問題時，就曾拿出「同化」的概念來表示反對立場。井上哲次郎說：「今日之日本與昔日的日本已有不同」，「我們既然已經創造了鞏固的國體，就必須努力地徹底保護之，維持之」，「一旦允許內地雜居後，我們卻又不能把由世界各地流入國內的外國人，同化於日本國，讓他們也接受日本國的言語、宗教、風俗、習慣等」，「我國的統一一致就會被毀損」，「變成完全不同的國體」，「允許內地雜居著實是破壞日本國體之開頭」。(79)

井上哲次郎對於「同化」的思考邏輯與前述下村宏、後藤新平的想法並不相

(78) 鈴木正幸，《近代天皇制の支配秩序》（校倉書房，1986），頁86-90。

(79) 井上哲次郎，《內地雜居論 續》（東京：哲學書院，明治22年），頁492-498。

悖。亦即雙方都認為「同化」基本上是擁有高等文明者對低度文明者所做的同質化運動。然而，與統治臺灣相反的是，井上以歐米人比日本人優秀因此無法「同化」他們為理由，為了避免讓日本「變成完全不同的國體」而站在反對外國人雜居於日本內地的立場。內地外國人雜居的問題和臺灣統治兩個問題看似不同，但是其出發點都是基於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要解決日本領土內居住與管轄了非大和民族和存有非「一視同仁」之政治現象時，所產生國體上的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而臺灣統治在面臨這個難題時，其方法也同樣是推出「同化」這個概念。

(二)以國體思想統治臺灣時所引起的問題

甲午戰爭後，臺灣統治就籠罩在國體論的磁場之下。在公開場合中，臺灣總督府及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把臺灣人定位成天皇的赤子、臣民。明治三十年（1897）教育勅語正式頒布於新領土，成為臺灣人道德上的最高準則。而言論界中主張以國體之精神統治臺灣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例如，明治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欄中刊載了題為〈國體論〉的論文，在介紹世界各國的國體都不如日本時，做了以下之結論：

我國體其優劣之相懸固不可同日而論矣。噫，一國猶之一家我天祖之勅祖，即祖宗之訓也。尊祖宗之訓，即子孫之責也。今臺民雖日新附，而既歸版籍，已有子孫之責，固當尊祖宗之訓。然蒙昧之徒未涉史乘，或謂我國亦與支那無異。余深惜之，乃作此說，蓋非為賢者之道……。(80)

（標點符號由筆者添加）

然而，就像這篇論文在批判「非為賢者之道」時所不打自招的，在血緣上、地緣上由漢民族和多種所謂的高砂族所構成的臺灣居民，都明顯地與天照大神之子孫的大和民族無關連，歷史上兩者間也缺乏擁有共同的神話之空間。把新附民當成天皇之赤子，要求他們善盡「子孫之責」地去崇拜天皇的「國體論」，其本身就與國體的原理相互背馳。

而既然把臺灣定位在國體的政治磁場中，強調要在臺灣實行「一視同仁」之

(80) 〈國體論〉，《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2年2月22日。

言論也就必然出現。明治二十九年（1896）八月二十日《臺灣新報》的記事「臺民必讀」中說明了翌三十年五月八日舉行臺灣住民國籍的選擇後，「本島土民有願為日本之臣民，而日本政府自必推恩擴德，一視同仁與本邦」（標點符號由作者添加）。⁽⁸¹⁾也就是對於選擇做為日本臣民的臺灣住民，總督府保證將實行一律平等的政策。同樣主旨的宣導言論也可見於翌年民政長官水野遵的諭辭。水野遵說國籍選擇以後，總督府將施行「無論日臺之人一視同仁，保愛如子，必欲同享太平，共洽德澤」（標點符號由作者添加）的政治。⁽⁸²⁾然而，「六三法」之存在否定了「一視同仁」的施政宣導，證明了這些立足於「國體論」思考的欺瞞性。總之，國體與臺灣統治的矛盾和破綻，是日本政府在理念、精神上企圖用擬血緣國家制原理來包攝異民族，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又一直把臺灣當做日本的異域而排除在「一視同仁」之實施範疇外。也就是說，在國體的架構中臺灣統治顯示了其理念與現實乖離的現象。而這種相互逆行的乖離當然會破壞國體政治體制的平衡，造成了臺灣統治上的混亂。⁽⁸³⁾

例如明治三十年（1897）九月，刊登在《六合》雜誌第201號的〈祖先教は能く世教の基礎たるべきか〉（祖先教能成為世教之基礎嗎？）中，這個雜誌的創始人大西祝引用日本著名法學者穗積八束的「祖先教」原理，亦即基於國體和國民道德之觀點說道：日本在統治臺灣時如果過度強調崇拜同一祖先的建國原理時，會凸顯出以國體政治磁場包攝臺灣的矛盾。所以重視國民福利不要過分宣揚血緣關係的同質性，才是實踐「祖先教」的基本精神和態度。⁽⁸⁴⁾這篇文章刊登後馬上就引來《太陽》雜誌的創刊者高山林次郎（按：高山林次郎筆名高山樗牛，是著名的文學家）的反駁。在明治三十年雜誌《太陽》第22號〈我國體と新版圖〉（我國體與新版圖）中高山說：日本政府不能為了收攬居住在臺灣這一塊蠻土上之居民的民心，而拋棄花了三千年歷史才完成的君民同祖這種貴重的思想意識，因此，他認為解決統治臺灣和國體問題的方法是乾脆把臺灣放置在國體的政治磁場

(81) 〈臺民必讀〉，《臺灣新報》，明治29年8月20日。

(82) 《臺灣新報》，明治30年2月22日。

(83) 山本有造，〈日本における殖民地統治思想の展開〉，《アジア經濟》，1991年1月，頁2-20；春山明哲，〈臺灣舊慣調査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を中心に〉，《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6號（綠蔭書房，1998），頁81-114。

(84) 大西祝，〈祖先教は能く世教の基礎たるべきか〉，《六合》，第201號（明治30年9月），頁44-49。

外。⁽⁸⁵⁾ 明治三十九年(1906)，著名的國體理論家北一輝自費出版了《國體論》一書，他露骨地說：「日清戰爭後，把支那人包含在國體內，就是日本政府自己破壞君臣一家論和忠孝一致論之開始。標榜日本民族是一個家族所膨脹形成的國體論，其根本思想不得不說是虛妄的。」⁽⁸⁶⁾

除了內地之外，在臺灣也出現了為數不少有關國體與新領土統治的文章，例如明治二十九年(1896)，對於所謂雲林事件中日軍大量殘殺臺灣居民之暴行，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就強烈地表示這種行為違反了「一視同仁」的統治精神，對宣揚國體之仁德政治是一大諷刺。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在《臺灣教育會雜誌》第4號中的〈公學校ノ修身科ニ就キテ〉(關於公學校的修身科)，著者高岡武明基於國體原理反對國民教育中設立宗教科，主張利用臺灣人所敬畏之儒教來推行國民教育。⁽⁸⁷⁾ 同年六月在同一雜誌第5號，木下龍發表了〈本島に關する卑見〉(有關本島之卑見)。木下對於只藉著朗讀教育勅語就試圖把臺灣人變成日本臣民之教育方針抱著疑問，其建議臺灣總督府不要光是強調唯心論，應該正視臺灣的實際狀況而著重唯物論，並考慮設立第二個教育勅語之必要性。⁽⁸⁸⁾ 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在《臺灣教育會雜誌》第8號，大稻埕公學校校長前田孟雄在〈公學校の修身科を如何にす可きか〉(公學校的修身科應該如何)一文中，提出由於血緣關係之不同及法律上臺灣人身分之曖昧等種種理由，修身科之實施「頗為困難，但拘於成規又無法全然廢止。所以目前只好先依照教育勅語來進行教學」。⁽⁸⁹⁾ 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月，在《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03號的〈國體と同化〉(國體與同化)一文中身為臺灣總督府的財務局長中川友次郎主張，把和日本人間沒有血緣關係的臺灣人收為養子，在法律上、社會上也把臺灣人當做自己的子女看待，以讓臺灣人也能祭祀日本人的祖先，以維持國體。⁽⁹⁰⁾

在此必須聲明的是，上述論述皆是關於擬血緣制國家原理與異民族統治之論

(85) 高山林次郎，〈我國體と新版圖〉，《太陽》，第22號(明治30年)，頁5509-5515。

(86) 北一輝，《國體論及び純正社會主義》(北一輝遺著刊行會，昭和25年)，頁91。

(87) 高岡武明，〈公學校ノ修身科ニ就キテ〉，《臺灣教育會雜誌》，第4號(明治35年3月)，頁1-20。

(88) 木下龍，〈本島に關する卑見〉，《臺灣教育會雜誌》，第5號(明治35年6月)，頁3-6。

(89) 前田孟雄，〈公學校の修身科を如何にす可きか〉，《臺灣教育會雜誌》，第8號(明治35年10月)，頁13-21。

(90) 中川友次郎，〈國體と同化〉，《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03號(明治43年10月)，頁18-27。

文，除此之外，有關「六三法」與「一視同仁」之論爭為數甚多，不過因為有關這方面已經有較多的研究，在此不再贅言。⁽⁹¹⁾而很明顯地，在日本發表的有關國體與新領土問題之言論都比較傾向於理論之論述，而在臺灣出現的論文因為牽涉到實質上的統治問題，則都比較具有現實性及急迫性。然而，不管如何，這些言論都凸顯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統治臺灣與國體基本上是相互矛盾的，這些論述之存在證明了，領有臺灣後「萬古不易」的國體開始呈現了動搖的現象。

日本在建構其國體時是以大和民族做為一個政治單位來設計、制定的。在理論上，國體的形成是借著強調日本人的純血性，並把其施政上的平等建立於純血性的前提上，而把異民族排除在外。這也就是鈴木正幸所指出的國體具有強烈的排他性。⁽⁹²⁾所以當日本在擴張領土或統治異民族時，本來在國內對於大多數的日本居民可以縱橫無阻，放諸各地皆準的建國理論便出現了各種矛盾，國體的聖典〈教育勅語〉中所宣揚的國體精神「可實行於中外而不悖」之說詞便明顯地產生破綻。把國體運用在團結國內民族時是可發揮極大的作用，不過在擴張海外領土時，國體反而帶來了許多限制和包袱。就如同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行的日本第一本百科事典《日本百科大辭典》第一卷裏有關殖民地之項目中所記載的，「殖民地大都是文化程度低落的原住民所先住的地區，所以縱使母國勢力尚未壯大，也不能讓殖民地的原住民在一視同仁下，享受與移住者完全同一的權利或以同一制度來統轄統治」。⁽⁹³⁾殖民地一詞中擁有強烈反對平等化要素，其定義本身就是「一視同仁」的否定。如果再把殖民地上的住民解釋為天皇的赤子與日本的臣民的話，其矛盾也就更加嚴重。總之，擴張海外領土，管轄異民族與日本的國體是呈相剋關係的。

然而，對於日本而言，成為擁有海外領土的東亞帝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實際上日本也不可能因為受制於國體而放棄領有臺灣的權利。因此，日本如果想在國體的束縛下替臺灣統治尋找出一條活路的話，其方法之一就是像井上哲次郎似地把「同化」拿來做為保護國體的道具，賦與統治臺灣的合理性。亦即是透過「同

(91) 有關此部分之研究除前揭春山明哲、山本有造外，若林正文等也發表過精彩的論文。

(92) 鈴木正幸，《近代天皇制の支配秩序》，頁 86-91。

(93)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一卷》（東京：三省堂，明治 44 年）。

化」讓國體和統治殖民地之事能相互融合，去除因為統治臺灣時所造成國體理論上的瑕疵。更具體地說，「同化」必須擔任的任務就是(一)讓臺灣統治「走入『一視同仁』」，其前提是消除臺灣統治中殖民地之形象；(二)「走入日本民族」，亦即是用任何的說詞與邏輯把臺灣人解釋成為大和民族，掩飾其管轄異民族之事實。事實上，我們在臺灣統治上所看到的「同化」論，其大部分就是被運用來執行這些任務的。當然要達成這些任務時國語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媒介。

七、從國體的角度來看「同化」論

在此，我們把前述伊澤修二、隈本繁吉、下村宏、學友會以及後藤新平的看法來當做分析對象，用他們的「同化」論述內容，來檢證這些人提唱「同化」的真正目的和用意。當然，這些人都是各時代主導國語「同化」政策的決策者和具有影響力之團體，其言論代表了「同化」論的主流。透過他們的「同化」論我們應該可以掌握半世紀中，國體是如何左右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政策，而成為最重要之變項。

(一)明治期的伊澤修二、學友會和後藤新平

國語教育的創始者伊澤修二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例會演說中，在詳細說明歐美的殖民地統治方式後說道：日本是基於國體的理論在統治臺灣，「並不是只要把臺灣純然當做殖民地，向本國盡幾分利益上的貢獻」而自滿，是「要把臺灣當做日本身體的一部分」來治理看待，⁽⁹⁴⁾ 所以必須以教育來把臺灣「日本化」，實施「一視同仁」的政策。因為伊澤本人是有名且忠實的國體信仰者，所以其所推行的「同化」是比較傾向平等化，為此伊澤與後藤新平曾有過數次的爭論和衝突。另一方面，伊澤的國語觀裏經常潛伏著上田萬年式的「同化於民族」之思考。雖然在國語國字論爭中伊澤曾與上田萬年有過想法上之爭論，但是基本上兩者的關係密切。渡臺前，伊澤曾促請上田給予奧援，支派語言學者

(94) 伊澤修二，〈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例會演說〉，《伊澤修二選集》（長野市：信濃教育會，昭和33年），頁593-595。

來臺以便順利推行國語教育，而上田也加以配合。領臺初期曾任職於學務部編纂課的小川尚義，即是當時上田推薦來臺的弟子之一。而擔任明治三十四年所發行的國語教科書編纂工作的大矢透則是上田的另一著名弟子。⁽⁹⁵⁾順便一提的是，曾於昭和期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總長的安藤正次也是上田的高徒。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二月，學友會曾經向兒玉源太郎總督提出〈臺灣經營策〉，其動機和目的其實就是在反對後藤新平把臺灣治理成殖民地。為此學友會還計畫把後藤的「暴政」向內地的高官控訴，其得理不饒人的憑據就是國體。〈臺灣經營策〉開宗明義敘述國體的淵源和歷史，並主張「所有有關本島經營的言論，行動都必須以帝國的國體為基礎慎而行之」。而其提倡「同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挽救在日、臺居民雜居的狀況下，因為人種競爭而勢將被淘汰的臺灣人，並希望把臺灣人教育成大和民族。對於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原理「強壓」弱小民族，「充滿貪婪欲望」的「掠奪主義」之國際社會風潮，學友會則加以嚴厲批判，並明言以國體為統治主軸的日本統治是不能合流於這種世界趨勢的。⁽⁹⁶⁾

被學友會攻擊的後藤新平，有時也贊成「同化」政策。雖然後藤積極地推行「六三法」的延續方案，並一直試圖把臺灣定位成殖民地，且對「同化」持著悲觀，甚至反對的態度，他認為國語教育的實施應該要適可而止。但為了應付政敵的干涉和攻擊並安撫臺灣人，後藤在特定場合裡對「同化」不但會有不同的詮釋，有時也同樣會把「同化」拿來做為稀釋殖民地統治色彩的道具。例如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為了推行實學教育，後藤集合了臺灣各地的士紳，舉行了揚文會，在會中的演說中後藤說：

臺灣之歸我大日本帝國版圖以來，諸君與我等均係帝國之臣民，誼切兄弟，抑維今上天皇陛下一視同仁，新附之民猶如赤子，於愛育臺民之道，無不夙夜軫念……我國之教育臺民，欲致其同化也，與夫征服他邦異種民族專期擴宏領土，持損人利己為計者，實有霄壤之別……我之教育者與國家國體始終一貫，須臾不離再我國體冠於宇內，使世界各國欽慕不措者，固我國民自天地開闢以來，奉戴 皇統連綿萬世一系之 皇室，

(95) 陳培豐，〈近代日本の國體イデオロギーと臺灣の殖民地統治〉，頁 28。

(96) 學友會，〈臺灣經營論〉。

其君臣則如父子，而國家則與天壤無窮所致也，其神代之事蹟故不贅述……故附隨國體尊嚴之教育制度，亦無非格奉 皇祖皇旨遺訓以 皇室仰為樞源。(97)

後藤新平這篇演說一反以往對「同化」之冷漠曖昧的態度，積極地表現其推展國語的意願，其熱烈的口吻甚至與其政敵伊澤修二之演說，學友會的論文極為類似。而致使後藤新平改變對於「同化」說法的因素，就是在揚文會的演說中後藤向臺灣的士紳們大肆宣揚了日本的國體，在國體這個變數的左右之下，「一視同仁」的施政方針也就不得被強調，「同化」教育的主張也自然地就登場了。

(二)大正、昭和期的隈本繁吉、下村宏和若槻道隆

隈本繁吉在大正期的國語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同化」構想之基礎也一樣是架構在國體上。他在反對板垣退助的「同化會」時所寫的論文中，一面提倡「同化」，強調「一視同仁」的治臺精神，一面則否定臺灣是殖民地。在說明學習國語的重要性、「同化」和忠君愛國思想的必要性時，隈本也說道：「與萬國相比較，很明顯地我們擁有相當優越的國體。而「同化」的根本是基於這個國體之下所形成的。三千年來以皇室為中心的我國國民雖然有異族歸化、加入，但在皇室之下大家渾然融合在一起，都變成一樣。」文中隈本繁吉把臺灣人當做是「同胞」，將來一定會成為「忠良的臣民」，而他也認為「在天皇一視同仁的德政下，王化所及之處，所有的人都是陛下的赤子」。(98)

當然，隈本繁吉也深信國語是讓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的最佳工具。在反駁板垣退助的「同化會」後不久的大正二年（1913）一月，隈本邀請了著名的國語學者芳賀矢一來臺訪問，並對全島公學校的國語教師做講習，宣揚國語教育必須立足於國體以培養臺灣人的國民性格等理念。芳賀與上田萬年同樣留學德國，同樣擔任帝國大學文科教授，曾經與井上哲次郎共同創立《日本主義》之雜誌。芳賀的思想中最具精髓的部分就是主張國語中含有日本精神，是培養日本人國民性格之

(97)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 第2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昭和12年），頁707。

(98)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て〉，頁10-14。

手段。把上田的國語思想更加發揚光大的不是別人，就是國體主義者芳賀矢一。因此芳賀的訪臺具有強烈的指標意義。⁽⁹⁹⁾而三年後的大正五年（1916），隈本在赴內地洽商制定臺灣教育令事宜時，更是曾經二次登門造訪上田萬年，希望談論有關國語教育之事。⁽¹⁰⁰⁾由上述種種跡象看來，無庸置疑的，隈本的國語教育構想中是存有濃厚的「同化於民族」之企圖。

一提到國體就會言及「同化」、「一視同仁」，繼而否定臺灣是殖民地的現象、在下村宏的論文中也可看到。事實上，下村在其私人秘密文獻中對於「同化」是持著與後藤新平相同的悲觀態度。然而，在提起國體的正式場合裏，他也是和後藤同樣，經常提出類似的「同化」論。在前述論文中，他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介紹並比較臺灣和世界各地殖民地之教育政策的不同，其結論也是透過「同化」實行「一視同仁」的新領土不同於一般殖民地。而他也認為「以同化的觀點來看，日、臺共學一定會實現。而把共學時代所學習的知識應用於畢業後的社會生活中，能幫助日、臺人民相互的溝通，讓臺灣人成為日本民族」，在此他也把「同化」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¹⁰¹⁾

昭和初期，社會主義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盛行於日本內地，對外則發生了滿洲事變，全國籠罩在不穩定的氣氛中，昭和十年日本本土展開了所謂的「國體明徵運動」，隨之，國體論的聲勢也高入雲霄。⁽¹⁰²⁾依附國體的「同化」論更是氾濫於臺日兩地的坊間。舉個例子來說，昭和十年（1935）十一月，曾經當過視學官而當時擔任學務部長的若槻道隆就公開地說道：

同化是否可能達成，如此之大問題不是現在這個小論文所可以談論的。然而可確定的事情是，所謂殖民政策之實行主體都是歐洲各國，基本上其政策與我國是全然不同。原因是歸於彼此之國體相異……以日本精神來看國體之觀念時，把臺灣當做殖民地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想法。不了解日本情況的學者至今尚在使用殖民地一詞。這是違反國體，也違背天皇

(99)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年2月），頁157-160。

(100) 同上註，頁170、171。

(101) 下村宏，〈臺灣教育令に就て〉，頁1-8。

(102) 《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一卷（東京：國立教育研究所，1974年8月），頁311。

的心意。在天皇的統治下不管居住在臺灣或是內地者，應該通通稱為日本人……理解國語而不使用國語者、發出反對內臺人融合同化之言動者、以外國之知識來比擬我國者，皆是不能辨識我國體之特異性。(103)

以若槻之身分地位來看，其言論當然具有代表性，並反映當時國語政策的走向。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流行於坊間之「同化」論之精神與內容更加傾向於「同化於民族」，上田萬年的國語思想更是露骨地被應用在「同化」教育政策中而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是在進入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後，各種的國語普及運動興起，有關言論中更經常出現直接引用「國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之現象，日本人與國語的關係更是被解釋成，「不是因為身為日本人所以才說日本語，是因為使用了日本語後才成為日本人」，後天性日本人的定義成為臺灣統治的主流價值觀。而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為了徵調臺灣人從軍，「一視同仁」則被拿來做為為國犧牲的正當化工具。當然，這些政策都是在國體之名義之下展開的。

總而言之，雖然時代、立場有所不同，但是上述的這些決策者、具有影響力的團體在敘述臺灣統治或言及「同化」時，都企圖用國語教育做為媒介，一面掩飾或稀釋臺灣統治中的殖民地形象，一面則自圓其說地把臺灣人也包攝在擬血緣制國家的原理之範圍當中。換言之，受制於近代日本國體的束縛，多數人在提倡國語「同化」教育時，都是為了塑造一個統治形象，那就是「走向『一視同仁』」與「走向日本民族」，其目的是試圖彌補因為統治臺灣時所造成國體上的破綻，以維持整個帝國政治體制的平衡。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是不完全等於一般殖民地學上的所說“assimilation”，而是受制於「國體論」而產生出來的一種統治策略。

八、結論

本論文試圖用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和歐美殖民地統治政策史的兩個觀點來探討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問題。研究取徑是先透過橫座標來勾畫出，與同時

(103) 若槻道隆，〈國語獎勵と國民精神鼓吹〉，《臺灣教育》，第400號10年11月，頁11-23。

代歐美殖民地統治相較之下，臺灣的「同化」國語政策之「光明面」及特異性。繼而透過縱座標，也就是拿日本的近代政治思想史來做為思考的根據，探討造成其特異性之原因與背景，以解析「同化」政策之原理與架構。經過這些檢證手續後，筆者的結論如下：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政策雖然具有以文明及文化為中心之兩義的實質內涵，同時是一種統治的意識形態，並具有濃厚的工具性。其原因是統治者試圖用「同化」做為道具來掩蔽其在臺灣實施不平等待遇以及管轄異民族之事實。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被當做道具時的「同化」及具有實質內涵的「同化」都具有明顯的流動性。而如此複雜並且強烈以國語教育為執行手段的「同化」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受到國體思想的影響或束縛。換言之，除了因應實際上統治之需要外，「同化」的內容、意識形態、實際態樣都是為了順應國體，或是基於想要護持國體，彌補因為統治臺灣時所造成國體上的破綻而產生的，也就是說日本政府花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冒著社會治安動盪的危險，甚至逆轉了世界殖民地統治潮流，改變自己傳統上統治異民族的方式而「舉國一致」地去實施的「同化」政策，這些都是為了維持天皇制國家政治體制的平衡而形成的統治現象。

傳統上我們一直把臺灣的「同化」統治定位成——「同化」就是心理與感情的日本人化。對於這樣的「同化」，臺灣人以拒絕接受，或拿出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來做抵抗，因而導致民族抵抗運動的發生，但卻又在皇民化運動中受到強力壓制——也就是說一談到「同化」就想起文化上的抑制與掠奪而予以全然的否定。然而，以國體這個角度來觀察「同化」政策時，這種既存的「同化」教育史觀則有重新檢討之空間和大幅修正之必要。其理由是在國體的束縛下，日本政府為了要賦與自己一個「一視同仁」的統治形態上之印象，在某一個程度下是有必要實施包含西洋文明要素在內的國語「同化」教育。因為在日本的近代史中，國語是吸取西洋文明的工具，具有「同化於文明」之意識形態。如果要建立一個把「無知蒙昧的民度引導向文明的境界」，也就是走向「文明之中」之形象，以釀造統治者即將「準備在臺灣實施一視同仁」的政治氣分時，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設置並且維持一定程度的公學校教育對於任何一個時期的主政者都是必要的統治措施。

當然，在這樣的殖民地統治架構下，臺灣出現了達成近代化教育的契機。因為，近代化教育的成功是必須建立在擁有近代化語言為前提的教育基礎上，而對

於當時臺灣人而言，國語是現成而且幾乎是唯一的道具。而「一視同仁」的平等如果和文明的進步，也就是和接受「同化」教育的程度成正比時，臺灣殖民地統治中「抵抗」的定義就有重新界定的必要。因為「抵抗」之定義假如是代表著被統治者加諸於統治者身上的政治壓力的話，臺灣人過度熱中於接受國語教育或是選擇性的吸取國語教育中「同化於文明」的要素，是統治者所最不樂見的「同化」結果，是最具脅威性的「抵抗」。因為臺灣人在文明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卻又無法享有適當的平等待遇時，就會暴露出統治者宣揚國體中「一視同仁」精神的欺瞞性，繼而造成天皇制國家政治體制平衡的動搖。相對的如果臺灣人拒絕「同化於文明」的教育，便賦與日本政府不願實現「一視同仁」統治的藉口，讓統治者達到一方面宣揚國體精神一方面實施差別待遇的政治企圖。由於篇幅的關係無法詳細說明，國語教科書內容中兩個「同化」的比例之所以會流動，就是因為臺灣人對於「同化於文明」一直抱著非常積極而且是選擇性的態度去接受，致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去調整其政策內容所造成的結果。當然，抵抗之定義如果重新檢討時，所謂殖民地抵抗者與協力者、皇民作家與非皇民作家的判定也有重新檢視之必要。再者，臺灣人如果對於近代文明有敏銳的反應時，「同化於文明」之內涵的緊縮，其結果必然會觸發臺灣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大正期由蔡培火等人所提倡的一連串臺灣話的語言改革運動，其背後就潛伏了試圖脫離寄生式攝取西洋文明的困境，以進行自力更生式的「同化於文明」之意圖。

因此如果以「同化於文明」的觀點來觀察臺灣的殖民地統治史，我們將會發現日治時期的「同化」教育中應該擁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歷史面像，那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圍繞著近代文明這個議題產生了賦與、接受、希求、拒絕、自立、抑止的過程。換言之，在臺灣的近代史中劃下重要一頁的「同化」統治應該包含著統治者被動式的實施或賦與臺灣人近代文明，以及臺灣人主動向統治者爭取、希求近代文明之歷程。在這樣的「同化」政策過程中所激發出來的所謂臺灣人抗日之意識，也就是連繫臺灣知識分子相互之間的「共同想像」之臍帶，其內涵與要素就不可能只是漢民族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思想，至少有極大部分是建構在臺灣人對於近代文明強烈的憧憬、渴望和追求之共同理想和歷史經驗上。⁽¹⁰⁴⁾

(104)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頁 305-309。

「同化」教育政策的重新解析和釐清，不但可以開拓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在這個充滿多種可能性的研究領域和方向上，我們或許比較容易尋找到與戰後臺灣的歷史或社會現象更可以契合的歷史空間。

引用書目

- 1896/08 〈臺民必讀〉，《臺灣新報》，明治 29 年 8 月 20 日。
1899/02 〈國體論〉，《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2 月 22 日。
1899/04 〈同化の方針〉，《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4 月 28 日。
1911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一卷》。東京：三省堂。
1919/12 〈田總督の訓示〉，《臺灣教育》212。
1974 《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一卷。東京：國立教育研究所。
- 一本喜徳郎
1922 〈皇室と國民の精神的連鎖〉，《太陽》28(8): 164-169。
- 下村宏
1919 〈臺灣教育令に就て〉，《臺灣時報》，大正 8 年 9 月號，頁 1-8。
- 上田萬年
1968 〈國語と國家と〉，《明治文學全集 44》。東京：筑摩書房。
- 大西祝
1897 〈祖先教は能く世教の基礎たるべきか〉，《六合》201: 44-49。
- 小熊英二
1994 〈差別即平等〉，《歴史學研究》662: 16-31。
1998 《「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關係》。東京：新曜社。
- 山本有造
1991 〈日本における殖民地統治思想の展開〉，《アジア經濟》1991(1): 2-20。
- 山根勇藏
1920 〈國語普及に關する施設調査〉，《臺灣教育會》213: 5-7。
- 中川友次郎
1910 〈國體と同化〉，《臺灣教育會雜誌》103: 18-27。
- 井上哲次郎
1889 《內地雜居論 續》。東京：哲學書院。
- 天澤不二郎
1939 《植民政策入門》。東京：巖翠堂書店。
- 木下龍
1902 〈本島に關する卑見〉，《臺灣教育會雜誌》5: 3-6。
- 北一輝
1950 《國體論及び純正社會主義》。北一輝遺著刊行會。
- 平井昌夫
1949 《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昭森社。
- 平野千果子
2000 〈文明化和法國植民主義〉（「文明化」とフランス植民主義），《思想》2000(9): 65-87。
- 矢内原忠雄
1988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
〈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地政策比較の一論〉，《國家學會雜誌》51(2): 155-191。
- 石井莊司
1983 《國語教育叢書 19 近代國語教育史》。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

石田雄

1998 〈「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思想》1998(10): 47-75；1998(11): 141-174。

尹健次

1994 《民族幻想の蹉跌》。東京：岩波書店。

伊澤修二

1958 〈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會演說〉，《伊澤修二選集》，頁 588-596。長野市：信濃教育會。

吉野秀公

1927 《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

安田敏朗

1997 《帝國日本の言語編制》。横濱市：世織書房。

西川長夫

1993 〈國家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文明と文化〉，《思想》827: 4-33。

何義麟

1986 〈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7): 47-88。

吳三連、蔡培火等

1971 《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社。

吳宏明

1981 〈殖民地教育をめぐって〉，《帝國議會と教育政策》。京都市：思文閣。

周婉窈

〈實學教育、郷土愛與國家認同〉，《臺灣史研究》4(2): 7-53。

松本龜太郎、滝野種孝

1898 〈臺灣經營策論〉，明治 31 年 12 月 13 日，R 30-78。

長尾一三二

1956 〈帝國主義政策と殖民地・從屬國の教育〉，《近代教育史》。東京：誠文堂新光社。

長尾龍一

1982 《日本國家思想史研究》。東京：創文社。

長志珠繪

《近代日本の國語ナショナル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 10 年 11 月。

1997 〈教化と文化の間——「國語」問題と領臺初期〉，《文化交流史研究》創刊號：75-102。

前田孟雄

1902 〈公學校の修身科を如何にす可きか〉，《臺灣教育會雜誌》8: 13-21。

後藤新平

1905 〈赤十字社事業に就て〉，《後藤新平文書》24-6-8。

1914 〈最近殖民政策〉，《同志社時報》115。

後藤總一郎

1997 〈國體論の形成——その思想史的祖型——〉，《歷史公論》1997(8): 69-75。東京：雄山閣。

持地六三郎

1910 〈犠牲の精神〉，《臺灣教育會雜誌》103: 27-34。

春山明哲

1998 〈臺灣舊慣調査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を中心に〉，《臺灣近現代史研究》6: 81-114。東京：綠蔭書房。

若槻道隆

1927 〈國語獎勵と國民精神鼓吹〉，《臺灣教育》第 400 號 10 年 11 月，頁 13-23。

海保洋子

1975 〈近代天皇制と「異族」の「臣民」化研究ノート〉，《歴史評論》1975(9)。

高山林次郎

1897 〈我國體と新版圖〉，《太陽》22: 5509-5515。

高岡武明

1902 〈公學校ノ修身科ニ就キテ〉，《臺灣教育會雜誌》4: 1-20。

唯 漢

1927 〈駁臺日社說的謬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4月24日。

國府種武

1931 《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第一教育社。

淺井政次郎

1899 〈普通教育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2年2月2日。

陳培豐

1995 〈近代日本の國體イデオロギーと臺灣の殖民地統治——上田萬年の國語觀を中心に〉，《中國研究月報》，頁16-37。東京。

2000 《「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

渡部宗助

1969 〈臺灣教育史の一研究〉，《日本教育學會》36(3): 222-232。

隈本繁吉

1915 〈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て〉，《臺灣教育》154: 10-14。

鈴木正幸

1986 《近代天皇制の支配秩序》。校倉書房。

幣原坦

1912 《殖民地教育》。同文館。

臺南師範學校付屬國民學校

1941 《國民科國語》。臺南：臺南師範學校國民學校研究會。

臺灣教育會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總督府

1945 《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

蔡培火

1936 〈臺灣に於ける國字問題〉，《教育》4(8): 69-75。

蔡錦堂

1993/07 〈日本據臺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38-289。

駒込武

1996 《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龜井孝

1989 〈天皇制？言語學的考察〉，《中央公論》1989(8)。東京：中央公論社。

豐田國夫

1910 〈日本の言語政策〉，《國語政策の研究》。錦正社。

鯖田豐之

1969 〈日本的平等主義の功罪〉，《教育と文化》，頁16-23。神奈川県：神奈川県立教育センター所報。

鶴見祐輔

1937 《後藤新平 第2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

梶原磯辰

1910 〈臺灣の過去及將來〉，《臺灣》1: 15-18。

〈カーコート氏臺灣ニ關スル覺書説明筆記 第一回〉，《後藤新平文書》7-33-3。

イ・ヨンスク

1996 《「國語」という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エメ・セゼール(著)、砂野子幸稔(譯)

1997 《歸郷雜記——植民地主義論》(《歸郷ノート—植民地主義論》)。東京：平凡社。

フランツ・ファノン(著)；鈴木道彦、浦野衣子(譯)

1996 《被土地咀咒者》(《地に咒われたる者》)。東京：みすず書房。

ベツゲル(著)；鈴木福一、西原茂正(譯)

1943 《列國の殖民地教育政策》。第一出版會。

Tsurumi, E. Patricia

1984 “Colonial Educ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In Ramon H. Myer and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k R. Peattie(著)、淺野豐美(譯)

1996 《殖民地帝國50年の興亡》,《20世紀の日本4》。東京：讀賣新聞社。

A Reanalysis of *dōka*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Colonial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Pei-fe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cept of *dōka*, commonly rendered as “assimilation,” by seeking to identify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Japanese assimilation policy on Taiwan via a comparison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assimilation policies and by reference to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In order to dissect the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 of *dōka* this article examines its relationship to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deas of language,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 of *kokutai* (polity)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promoted by Ueda Mannen.

I argue that although *dōka* policy in colonial Taiwan was center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t also had an intensely ideological and instrumental character. Both the instrumental and substantive aspects of *dōka* displayed a marked fluidity throughout time. Many of those who promoted assimilationist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used Ueda Mannen’s theories about the Japanese language to create an image of rule expressed by slogans such as “Toward imperial impartiality (*isshi dōzen*)” and “Toward Japaneseness (*nihon minzoku*).” Their attempts were motivated by the need to mend a perceived rupture in the Japanese pol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and to maintain equilibrium of the overall imperial system. This was because rule over alien peoples contradict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 common ethnic heritage and equality of status among imperial subjects that we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Japanese polity.

Dōka as extended to Taiwan is thus not completely equivalent to ideas of assimilation as generally understood in western colonial studies. Instead, it must be seen as a strategy of rule that was a product of the need to mimic, modify, and employ on Taiwan the basic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 Japanese polity was founded.

Keywords: *dōka* (assimilation), *kokutai* (polity), *isshi dōzen* (imperial impartiality), Ueda Mannen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